

目 录

引言 由“重写文学史”说起	001
第一章 文学史与书写	01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学史书写的相关背景与范畴	011
第二节 西方文学史书写实践的经验与思考	038
第二章 文学史书写中分期问题的实践及思考	049
第一节 相关背景与范畴	049
第二节 两汉文学史家的分期实践及思考	084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家的分期实践及思考	115
第四节 刘勰的分期实践及思考	137
第三章 文学史的编撰方式	179
第一节 以人为纲	185
第二节 以文为纲	275

第三节 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学史编撰方式·····	290
结 语·····	305
参考文献·····	311

第二章

文学史书写中分期问题的实践及思考

第一节 相关背景与范畴

一 分期的意义和原则

时间，是构成历史的要素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第一要素，因而史家对时间非常尊重。同时，对时间的感知力和把握的科学度也就成为史家的重要素质。那么，如何运用时间来展现历史呢？

首先，通过特定的时间概念对历史进行分期，是历史书写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思路和方法。罗素曾经说过：“世界全是各种点和跳跃。”基于这一观点，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人类都面临各种偶然的、未预见到的、新的、生气勃勃的和革命性的事件，这些事件可能会指引历史改变原本的发展路线从而走向新的征途，由此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可以通过这些事件进行确定。作为史家，所寻求的有意义的东西正是这些事件，也就是各个时代的不同点，也就是对

历史进行分期的必然性所在^①。

其次，法国哲学家昂利·柏格森则把历史视为一条“无底的、无岸的河流”，时间在其中川流不息，绵延不止，其形态是线性，而非无数不同的点，“它不借可以标出的力量而流向一个不能确定的方向”^②，因此他反对那种混淆质量性的绵延时间与数量性的纯一空间的、把时间生生截断的做法，所以通过分期对历史进行研究丝毫没有可行性。

最后，第三种观点则相对温和，它将历史的点和线相结合，也就是将历史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这种中和的思路可以通过美国哲学家马克·波斯特的认识表现出来，那就是展现历史时引入时间进行阶段的区分，并非是要划定一个清晰的分界线，而是要提醒人们关注某种革新：“一个历史阶段的强行推出意味着的，可能不是从一种存在状态过渡到了另一状态，而是意味着一种复杂化，意味着将一种结构与另一种结构加以迭合，意味着对同一社会空间中的不同原则进行增值处理或多重处理。阶段或时期并非彼此相继而是相互含盖，并非彼此置换而是相互补充，并非按顺序发生而是同时存在。”^③ 如此，运用特定时间对历史进行分期，只是史家在书写时主观的创作手段，并非真实历史的内在存在^④。

以上三种观点是西方思想家关于时间和历史的书写的思考。反观国内文学史研究者的认同，则更多地体现于第三种相对中和的观点，希望史学家可以很好地把握“流动感和纵深感”^⑤，而这正是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第3~4页。

② 昂利·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刘放桐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28页。

③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25页。

④ 至于第一性质上的历史，是否具有分期的内在存在，暂不属于文学史书写的讨论范畴，故而不做进一步的探讨。

⑤ 葛红兵：《论文学史的时间结构》，《江海学刊》1995年第5期，第152页。

展开历史研究的基础。

分期正是人们用以建构历史的重要手段。^①

作为文学史家，从宏观角度言之我们离不开时期。^②

在文学史的撰写中，历史分期是必须深入研究和探讨的一个问题。^③

历史是连续不断的，文学现象同样有其来龙去脉的连续性。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只是为了准确地把握一定历史阶段的主要特征，以便更明确地阐明它的发展过程和规律性。^④

既然分期是具有主观设定的人为手段，但历史毕竟是真实的存在，那么在对于分期和书写协同共生这一普遍的认知基础之上，分期又有哪些需要遵守的准则呢？同时，文学史的学科性质，上文已经有所交代：既兼有历史科学的性质，又具有文艺科学的基本特征，故而文学史的分期首先应当属于历史分期的范畴，理应遵循相应的历史分期方法。

历史是过去，书写是回顾。班纳特（William J. Bennett）说“历史”就是“组织起来的回忆”（organized memory），“是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的组合整理”，那么：“什么情事才能进入集体的记忆领域？这些筛选又由谁决定？是否能为人力决定？”^⑤ 郑振铎对此有过清晰的认识：“所谓‘历史’，昔人曾称之为‘相斫书’，换一

① 陶东风：《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278页。

② 葛红兵：《论文学史的时间结构》，《江海学刊》1995年第5期，第154页。

③ 张炯：《论中国文学史的史观与分期、前沿问题》，《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第12页。

④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186页。

⑤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78页。

句话，便只是记载着战争大事，关乎政治变迁的。在从前，于上云的战争大事及政治变迁之外，确乎是没有别的东西够得上作为历史的材料的。”^① 在古代社会，史官所记都是关乎政治民族集体规范的大义之事。个体相对于集体大众来说，需要借助立功、立言和立德才能达到相应的“资格”。所以，有关政治、民族、集体层面的事件就是历史书写最重要的分期标准。“通史当然应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来分期，因为它要全面考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许多方面。”^② 可通史之外还有专史。“专史虽然也要受到如通史内容所讲的整个历史环境的制约，但主要应该考虑专史本身。”^③ 文学史作为文学的专史，“从理论上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当然要为社会存在所影响所决定，每一时代的文学，都不能脱离当时经济和政治。因此，文学史的分期是不能不考虑与之相应的历史分期的。但文学也有它自己的特点，经济和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究竟何时以及如何在文学上反映出来，还要受到文学内部以及其它意识形态诸因素的制约，因此，它的发展进程并不永远是与历史环境同步的。……总之，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④。

那么“文学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又包括哪些呢？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提出，文学史划分的依据应当是文学规范的更替，不同时期的文学史体现的是不同的规范：“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一个特定的时期不是一个理想类型或一个抽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1页。

②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178页。

③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178~180页。

④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178~180页。

象模式或一个种类概念的系列，而是一个时间上的横断面，这一横断面被一个整体的规范体系所支配，从来没有任何一件艺术作品能够从整体上显现它。文学上某一个时期的历史就在于探索从一个规范体系到另一个规范体系的变化。”^① 而所谓文学史规范主要是指制约一个时期文学史的总体原则，包括基本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套体制、运行规则。“即使我们有了一套简洁地把人类文化史，包括政治、哲学及其他艺术等的历史再加以细分的分期，文学史也仍然不应该满足于接受从具有不同目的的许多材料里得来的某一种系统。不应该把文学视为仅仅是人类政治、社会或甚至是理智发展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如果这样划分的结果和政治、社会、艺术以及理智的历史学家们的划分结果正好一致的话，是不会有人反对的。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作为文学的文学发展史。”^②

陶东风从哲学高度对文学史进行整体思考后指出：“并非任何分期模式都合理。……就文学史而言，文学史的分期标准必须符合文学的特殊性，而不是简单套用通史或社会史、经济史、政治斗争史、思想观念史等的分期方法和分期标准，后者不是从文学的发展中概括出来的，而是从其他人类活动的历史中概括出来的，它当然也就不能担当划分文学时期的使命。因此，文学史分期标准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它必须是从文学自身的特征和历史规律性中抽象出来。”至于文学史的分期依据，“当为时代整体文体倾向和结构形式规范的交替，这种交替反映了人类在特定时期主导的审美倾向，同时间接地与该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哲学、宗教等倾向相关联”^③。

①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307页。

②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306页。

③ 陶东风：《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278~286页。

不管是文学规范还是文学系统，都是在尊重历史演变规律的前提下，从文学自身特质出发的。这个前提非常重要：“强调文学史的历史科学属性，并不说明治现代文学史的人就可以脱离或不关心现实，包括社会生活和当前文艺创作。这其实是一个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研究文学史当然要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是连续不断的，文学现象同样有其来龙去脉的连续性。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只是为了准确地把握一定历史阶段的主要特征，以便更明确地阐明它的发展过程和规律性。”^① 所以，分期需要综合考虑社会、政治与文学的多种因素，单一地从政治或文学的角度出发都会导致某种偏颇或失误。同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重视，既然是中国文学史的书写，那就应该尊重中国历史的演变规律和分期规则，而不能将之强行塞入世界史的演变规律和分期规则中。^②

二 中国的时间、历史与分期

（一）时间—历法

文字和历法是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探究我国史学的起源，应当从文字出现的时候谈起。因为有了文字才能有历史记载，有了历史记载才能编纂成为史书，在记录史实和编纂史书的过程中才产

①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185~186页。

② 有学者“就文学史撰写实践中采取的有代表性的不同分期依据作简要考察”，列出四种分期类型：分别是以黑格尔的艺术史分期为代表的“以文学类型演变的不同历史阶段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以勃兰克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为经典的“以文学主流思潮的嬗变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以朝代的更换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和“以多层次兼顾的原则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也有学者根据对文学本质的不同认识，认为文学史分期亦存在他律论和自律论两种模式。前者“由于文学史没有获得自己的自主品格与独立地位，反映在文学史的分期上，就是以一般通史的分期方法或社会史、政治史的分期方法代替文学史的分期方法。我国的几部主要的古代文学史都是采用通史的朝代分期法或社会形态分期法……中国现代文学史则一律用社会政治的发展阶段来划分文学时期”，后者“强调文学史的时期应当以文学自身的阶段性为依据，而这种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常常被认为是文学的形式规范、结构惯例的交替兴衰”。陶东风《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281~282页。

生了史学。”^①有了文字，就可以把所发生事件的原因、经过和结果都记载下来。有了文字记载的材料，才能编纂成史书和产生史学。历法的产生，是史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史学是以时间为基础的，就像地理以空间为基础一样重要。有了历法，才能推算时间，确定岁时。

历法—时间—史学，这是治学思路。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国人对时间的理解从生活而来，进而促进思维模式的形成，不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变世界。华夏文明诞生于黄河流域，优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这一传统的农业大国。各种生产条件有赖于自然界的馈赠，风调雨顺直接关系到岁末收成，这一地缘背景孕育了崇尚自然的中国文化：四时顺变的时序概念正是其中之一。《说文》：“时，四时也，从时寺声。”《段注》：“春秋夏冬之称，引伸之为凡岁月日刻之用。”^②《尧典》中记载尧帝：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③

① 杨翼骥：《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第151页。

② 许慎：《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302页。

③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第二·尧典第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8~31页。

这段说明“四时”来源的文字具体地向我们揭示了“四时”的产生与物候、天象、人类活动的密切关系。

对地处北半球温带地区的中国人来说，四季的相生相代循环不已，日升月落的循环与星空的“天道左旋”等都是常见的自然现象，所谓“四时之更举，无所终”^①是也。而由于先秦人的时间意识具有与天象物候密切相连的特点，因此他们把时间理解为循环的也就不难理解了。史官们由于司职观天，所以“循环时间”的意识就更为强烈，史华兹说：“中国人关于时间的概念基于季节中自然现象的变换，同时也来自于天体有规律的运动。从日、月、年的轮回开始，中国的天文学家逐渐将较长的循环和较短的循环用一个体系加以阐释。”^②四时是相生相代的自然变迁，也代表了对于一年时间的整体性认识，一年又一年的四时叠加就形成了国人对于历史时间的辨识基础。

康德认为，时间是我们的先验表象，是内心直观的形式，离开主体便不能独立存在。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仅仅内心地直观自己，就没有时间，时间只有对于现象才有客观有效性，时间只有在事物成为现象、成为感性直观的对象时才能表征出来。^③从这里看来，先秦人的时间意识比我们关于时间的常识丰富、生动得多。所以当人们开始有意识书写历史的时候，其时间观念势必以自然时间为基础，基于古人对春夏秋冬的四时认识，“若尧典之四时，左传之三时，皆谓春夏秋冬也”^④，造就了《春秋》的体例是按照四时顺变为序书写历史的，《左传》进而承袭之，后世史书基本多以此为模板。同时，季节更替和万物荣枯以及背后对于天象运行的理解，形

① 房玄龄注，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揆度第七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447页。

② 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③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61~65页。

④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中华书局，1987，第572页。

成了简单朴素的整体性的时间认识，由自然及人自身，生命的存在、年华的盛衰进一步引发关于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又由于四时顺变使得人们可以重复体验进而总结各种经验，“四时+经验+思考”通过文字展现在史书之中，有利于古人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最终这种总结和探究也成为史书蓬勃发展的基础。

我国早期的历史书写著作，最负盛名的是《尚书》《春秋》《左传》三本。其中，《尚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历史散文集，收录了上自尧舜下至秦穆公的某些君主、贵族大臣的重要言论。《尚书》的内涵流露出作者关于循环性的意识，但作为记言之作并没有明确的时间顺序。《春秋》作为我国“最早的纲目式编年史书”^①，虽用鲁国纪元，却全面记录了244年间中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重大活动，“所以也是我们第一部通史”^②。相比《尚书》的无时序性，《春秋》以年月为经、史实为纬，将自然的历史通过文字系统化书写，为后世史书的撰写在体例上，尤其是时间观念的范式方面奠定了明晰的基础。以“隐公元年·二年”为例，其以“年·时（季节）·月·日·记事”为体例。其中年是鲁国之君主、鲁公在位纪年；时是春夏秋冬四季；月是阴历纪月方法，从正月开始；日则是天干地支的代表。作者就这样按照自然界四时顺变的思维记录把当时各国发生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不仅可为史实资料，也为后世历史书写提供了基本的时间观念。《左传》继承了这种由《春秋》开创的编年体体例，将二百多年的历史按时间发展的先后时序进行排列，连贯完整地记载史事，而且必要时还能突破编年系事的限制，运用倒叙、插叙、预叙等叙事方式，把分散于不同年份的事情集中在一起叙述，使情节更为丰富、事件更为完整、

① 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48页。

② 朱自清：《经典常谈》，中华书局，2003，第41页。

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弥补了《春秋》因只有顺叙一种叙事方式而造成的叙事过于简略和呆板的不足。

（二）时间—比较

农作物生长遵循四时原则，人们在年复一年的春种秋收中不断增长见识，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成功中不断校正判断，进而剥茧抽丝总结出各种经验，在大量事实基础上总结升华为理论。时间给予自然的历史，反映在书写的历史中，也同样要经历类似的过程，那就是在相似事物的比较中寻求关联，通过比较梳理脉络。《左传》已将时序从《春秋》编年剪裁为叙事需要的时间组合，时间的自由在史家笔下越发灵动跳跃，不同时间单元的人物和事件，为了实现书写者的目的开始组合起来，进而呈现更为清晰的主观的逻辑的历史。

早期的历史文献中，史官根据定位不同，职能也有所区别，是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不管记言还是记事，史官面临的基本都是同一个（群）人物对象：执掌政权者。在信息相对不互通的时代，从客观条件到主观定位都只能以同一个国家的君主（和群臣）为主体，当同一个国家的权力发生转移，“先王”和“今王”慢慢地同时出现在史官的笔下，但多继承，鲜比较，推崇先王而已。同一时期内的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拘囿于主客观条件，比如君王之间要等到春秋末期出现并行政权的历史条件之后才会出现横比以及跨政权的纵比。

《尚书》中关于帝王间最早的对比见于《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①而官员的对比最早见于《大禹谟》，当舜帝想要将王位让与大禹时，大禹非常谦虚地推荐了皋陶，认为自

^①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第三·虞书·舜典第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50页。

己的能力逊于皋陶，但舜帝却非常肯定大禹的功绩，坚持让与其地位：“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罔朕师。’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①《益稷》篇中舜帝和大禹的对话提到了帝尧的儿子丹朱，并将其作为反面典型用以类比：“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颺颺。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②这也是介于君主和臣子之间的身份，同上述两个例子属性基本相同。

夏朝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了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的先河，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从夏朝的建立开始。夏朝共传十七代，因为昏庸被商朝灭亡后，关于夏商两个独立王朝之间的对比开始屡屡出现于文字记载之中。

仲虺乃作诰，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缙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惟王不途声色，不

①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第四·虞书·大禹谟第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90~91页。

②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第五·虞书·益稷第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23页。

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①

曰：“呜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于其子孙弗率，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天家邦，终于四海。”^②

伊尹申诰于王曰：“先王惟时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绪，尚监兹哉！”^③

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曰：“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④

微子若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底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

①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第八·商书·仲虺之诰第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96~197页。

②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第八·伊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03~204页。

③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第八·太甲下第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13页。

④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第八·咸有一德第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15~216页。

于今。”^①

而商周易代之后，关于夏商周的比较自然也就兴起。

王乃徇师而誓。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义民，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②

抑或是历数先祖的功绩以及成就：

王若曰：“呜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启土，公刘克笃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③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

①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第十·微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61~262页。

②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第十一·泰誓中第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74~277页。

③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第十一·武成第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90~291页。

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年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①

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兹惟后矣。谋面，用丕训德，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亦越成汤陟，丕厘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

呜呼！其在受德瞽，为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钦罚之，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万姓。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贵、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

①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第十六·无逸第十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430~433页。

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

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德之彦，以义我受民。^①

周公旦将前人的立政之道一一说与刚刚即位的周成王，望其“克用常人”，“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任用贤人协助君主治理国家才能使周王朝长治久安。其中，通过君主划分不同时期的思路已经非常清晰了。同时从君王的对比，进一步发展为前后几代辅政大臣之间的对比：

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义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义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②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③

①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第十七·立政第二十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467~476页。

②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第十六·君奭第十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441~442页。

③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第十六·周书·君奭第十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444~445页。

通过对《尚书》的梳理可以发现，在我国早期的文献资料中，随着社会从原始形态演变为社会形态，自然时间观念演变为社会时间观念，史官的视野和职能随之扩展，前后政权的君主之间的比较随之产生，并从相邻两代的比较逐渐复杂化为跨越朝代的比较。同时这种历史的追溯由政权统治者扩展到政权的辅佐者，也就是从君到臣——君贵为天子，臣本为凡人，当比较的逻辑扩展到凡人，史书的书写也就可以将更多领域的普通人（文士）纳为对象了。于是，到了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从学术的角度对士人进行对比已成非常普遍的现象。以《孟子》为例，其中除了君主之间的比较之外，身份未为显贵但却具有才学之人之间的比较逐渐增多。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

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①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

^① 焦循：《孟子正义·公孙丑上》第一章，中华书局，1987，第173~186页。

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①

在这一节中，出现多处人物之间的比较。公孙丑将孟子与管仲和晏子相比，孟子引用他人之说提到曾西和子路、管仲的对比，又将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都作为辅相之贤人并举。之后公孙丑继续向孟子提问，举出“善为说辞”的宰我和子贡以及“善言德行”的冉牛、闵子、颜渊，说明兼而有之的孔子堪称“上圣”，又根据承袭孔子的程度将子夏、子游、子张和冉牛、闵子、颜渊分为两类，并试图对应孟子和孔子的继承关系及定位，进而又想知道伯夷、伊尹和孔子的异同之处，孟子的回应介绍了宰我、子贡、有若对孔子的了解和崇高的评价。

^① 焦循：《孟子正义·公孙丑上》第二章，中华书局，1987，第213~218页。

其后，孟子多次举出历史人物与孔子进行对比，如《万章下》中分别介绍伯夷、伊尹、柳下惠的圣贤风范，虽然在某一方面达到圣贤的水准，却难如孔子之集大成：“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①《告子下》篇继续以仁的标准评判上述三位贤者：“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②

孟子将历史上的人物梳理出其共同之处，放置于一个论点之下，用以横比，最为知名的还是这一则：“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③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六人都曾有过艰辛的经历，由此给他们带来了辉煌。舜在之前的文章中出现，多数都是和尧、禹作为君主的对比，比如前引《尚书》的例子，可他此处竟然与其他辅佐贤士并举，虽然舜也确实曾经是尧帝的臣僚，但超脱政权之外的比较伴随着社会形态和历史观念的进步，也确实有所发展，而这一切都为史书的分期提供了准备。

到两汉的文献中，我们逐渐发现将类似的人物或者事件同时列举出来，通过比较的方式，或同褒扬，或分优劣，或共证事的情况

① 焦循：《孟子正义·万章下》第一章，中华书局，1987，第672页。

② 焦循：《孟子正义·告子下》第六章，中华书局，1987，第829~830页。

③ 焦循：《孟子正义·告子下》第十五章，中华书局，1987，第864~872页。

愈加增多，并且由两两对比逐渐变为多途，或者三人以上，或者一和多人。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比较也是源自史书，早期多集中于历史人物（多是帝王），这也符合史官的定位和职能要求。

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请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①

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②

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然后喟然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③

鉴于文学逐渐和史学分离，文学的社会地位逐渐提升，统治者开始注重文学才能，文士尤其是兼任官员的亦随之思考文学的发展，如此才进入文学史领域。上文谈及文学史家的双重身份时已有所交代，所以在不同的书籍中都开始出现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之间的比较。关于君主间的比较，如班固“武帝纪赞”将汉武帝与文景比

① 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十》，中华书局，1959，第436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中华书局，1959，第3117页。

③ 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第五十八》，中华书局，1962，第3592页。

较：“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①扬雄在《吾子》篇中将赋家进行比较：“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②颖容在《春秋释例序》中也对时下的知名学者们进行平行对比：“汉兴，博物洽闻著述之士，前有司马迁、扬雄、刘歆，后有郑众、贾逵、班固，近即马融、郑玄。”^③如此之例证不胜枚举。

对比的意识和操作也是不断伴随着人们认识和经验的扩展而进步的，从同时代相似的人或人群的对比，到跨时代相似的人或人群的对比，再到跨越多个时代的多个人或者人群的对比。而跨越多个时代之所谓时代，其实就是不同的阶段。而何为不同的阶段，就需要时间节点来划分。于是历史书写中出现两个代表时间节点的关键词：断限和分期。

（三）断限一分期

从史学的角度而言，断限问题是史书内部结构确立的重要一环。史书的断限，指史书所记史事的起讫年代，是由两个时间节点构成的时间阶段。断限基本随着编年体史书的产生而明确概念。《春秋》作为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 722）到鲁哀公十六年（前 479）的历史，历 12 代君主，计 244 年（依

① 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中华书局，1962，第 212 页。

② 扬雄：《法言卷二·吾子》，中华书局，1985，第 5 页。

③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八十六·春秋释例序》，中华书局，1958，第 938 页。

《公羊传》和《穀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242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但是在《春秋》原文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作者关于时间断限的明确说明，毕竟时间久远，或者作者尚未有如此清晰的认识，也可能是有所亡佚。但是到了有汉一朝，当跨越时间和地域的综合性史书出现的时候，比如《史记》，关于书写历史的断限已经是作者心目中必须交代的一个基本问题了。

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①

《太始公自序》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②

《报任少卿书》：“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③

《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第一》：“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④

《史记卷十四·诸侯年表第二》：“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⑤

《史记卷十四·诸侯年表第二》：“【索隐述赞】太史表次，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华书局，1959，第3321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华书局，1959，第2494页。

③ 萧统：《文选卷四十一·报任少卿书》，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865页。

④ 司马迁：《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第一》，中华书局，1959，第488页。

⑤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诸侯年表第二》，中华书局，1959，第511页。

抑有条理。起自共和，终于孔子。十二诸侯，各编年纪。兴亡继及，盛衰臧否。恶不掩过，善必扬美。绝笔获麟，义取同耻。”^①

《史记卷十九·诸侯年表第七》：“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长沙王者，著令甲，称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国。至孝惠时，唯独长沙全，禅五世，以无嗣绝，竟无过，为藩守职，信矣。故其泽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数人。及孝惠论孝景间五十载，追修高祖时遗功臣，及从代来，吴楚之劳，诸侯子弟若肺腑，外国归义，封者九十有余。咸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②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③

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④

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⑤

此外，从孔安国在《尚书》序言中所提到的“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⑥，班固在《汉书》中所叙述起讫年

①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诸侯年表第二》，中华书局，1959，第683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十九·侯者年表第七》，中华书局，1959，第977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中华书局，1959，第1943页。

④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中华书局，1959，第1935~1936页。

⑤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中华书局，1959，第1936页。

⑥ 萧统：《文选卷四十五·序上》，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032页。

代“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①，都可以看出断限在史书中的普遍应用。

受史书影响，文学史的撰述也陆续出现断限问题，比如锺嵘《诗品》序言，堪称五言诗小史，其断限标准就是“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②。刘勰生平历经宋、齐、梁三朝，一般认为其《文心雕龙》完成于公元500年前后，即齐明帝和齐和帝时期，不同于锺嵘，刘勰所品评的作家截止于东晋^③。此外，沈约《宋书》作为刘宋一朝之“正史”，在《谢灵运传论》中回视了远古至刘宋时期的文学发展历史，以颜延之（384~456）和谢灵运（385~433）为限。而萧子显《南齐书》同样作为萧齐之“正史”，其《文学传论》中涉及的作家迄于鲍照（？~466）和汤惠休。据史书记载，鲍照卒于宋明帝泰始二年（466），而汤惠休则史载不详，似未入梁，可知萧子显所述之文学史断限大体为汉末至宋齐。虽然文学史也涉及断限问题，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分期问题。因为相比断限的两个节点，分期则需要三个以上的时间节点，也是在断限基础上更为进步的时间思考，体现了更为科学的时间意识。由此，作为在对历史进行总结回顾的时候所需要的时间方法，分期问题正式进入文学史书写，并且成为最基础、最亟待解决的重点之一。

三 文学史通行的分期方法及编撰实践

上文从中国的时间观念出发进行分析，发现四时顺变和循环的两大自然时间观念，直接影响了史家的书写时间观念，因此当其行

① 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第七十下》，中华书局，1962，第4235页。

② 锺嵘：《诗品注·总论》，陈延杰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第4页。

③ 王达津：《论〈文心雕龙〉品评作家迄于东晋》，《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第60页。

使职责书写历史的时候，就会采用跨越时间的方式对同一类型的人物及相关事件进行比较研究，“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从先秦到两汉已经形成了明确的书写时间逻辑。当时间跨越的长度增加，历史累积了越来越多的政权，不同的政权内部统治者更迭数量增加，比较就不能无限度地延展，而需要确定一个相对具体的时间阶段，所以需要书写者说明起讫的时间点。而一个起讫阶段之内，为了更清晰地进行阶段内的比较又出现新的需求，那就是标举更具体的节点用以划分更小的时间阶段，这就是分期。

历史书写的分期不是协商一致的结果，而是史家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自发寻求的适合的思维和操作模式，当然这属于传统文学史书写的模式，因为那时候仍属于独立书写的态势。传统文学史书写的分期运算是本书研究的重点，笔者将会在后续几个章节结合具体文献详细地分析，这一节则主要讨论近代以来作为舶来品的“文学史”书写通行的分期方法有哪些，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又有哪些，以期同传统的文学史书写分期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为未来的文学史书写寻找更合乎中国逻辑的路径。

理论探讨的林林总总，反映在实际编写中具体的分期方法，却面临仁智有别的状况，亦是未有定论。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工作，在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处理上，试探着，前进着，粗略统计有如下几种主要的分期方法。

第一种分期方法导源于近邻日本——日本则是受欧洲的影响。日本文学史以编年体居多，一般分为上古、古代、中古、中世、近世和近代几个时期。日本学者常使用“古代”“中世”“近世”这样的分法，漂洋过海影响了中国的学者。“中国第一部在较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黄氏的《中国文学史》就是用了这种分期方法。”后来，“为了与中国习用的‘古代’一词相区别，中国学者常将此种分期法中的‘古代’改称‘上古’，从而‘中世’也常被

改称‘中古’了”。^①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就反映了与这种分期法的渊源关系，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和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也均以上古（唐虞、三代至秦）、中古（两汉至隋）、近古（唐至明）、近世（清）来划分中国文学的时段，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中外文学交流和新旧文学衔接”为着眼点，也是按照上古期、古代期、中世期、近代期和现代期分期论述。从社会形态角度考察，古代是奴隶制及其以前的时代，中世是封建制时代，近代是资本主义时代，而近世则是封建末期并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时代。对于这种分期方法的优势，有学者便指出：“从文学背景的社会形态与思潮特点和文学本身的发展特色结合起来考虑，采用以下三段式的历史分期似乎更为合理，线索也更为分明。即分为上世（从先秦至唐五代）、中世（从宋辽金至清代）、近世（从鸦片战争至今）三个大时期。”^②而“由于上述的历史分期法本是从社会形态出发的，以此来划分文学的发展阶段再附以说明，实际上是既顾及文学与社会形态的联系又顾及文学本身特点的分期法。因为人性的发展本离不开社会的发展，在从事文学史的分期工作时考虑到社会形态，自有其合理的一面”^③。所以也有学者直接以社会形态进行分期，以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为例，它分为奴隶制时代的文学、地方分权的封建时代的文学、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创始时代的文学、中央集权的封建制衰弱时代的文学等阶段。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相比上古、中古或者是世纪百年以及所谓“社会形态”的方法，大体依照朝代政权的更迭进行分期的方法，

① 章培恒：《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第109页。

② 张炯：《论中国文学史的史观与分期、前沿问题》，《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第12页。

③ 章培恒：《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第110页。

更为适合我们的国情传统，这就是第二种分期方法：王朝分期法。钱锺书曾明确指出：“且断代为文学史，亦自有说。吾国易代之际，均事兵战，丧乱弘多，朝野颠覆，茫茫浩劫，玉石昆冈，惘惘生存，丘山华屋。当此之时，人奋于武，未暇修文，词章亦以少少衰息矣。天下既定于一，民得休息，久乱得治，久分得合，相与燕忻其私，而在上者又往往欲润色鸿业，增饰承平，此时之民族心理，别成一段落，所谓兴朝气象，与叔季性情，迥乎不同。而遗老逸民，富于故国之思者，身世飘零之感，宇宙摇落之悲，百端交集，发为诗文，哀愤之思，僭若风霜，憔悴之音，托于环珞；苞粮黍离之什，旨乱而词隐，别拓一新境地。赵翼《题梅村集》所云：‘国家不幸诗人幸，说著沧桑语便工’，文学之于鼎革有关，断然可识矣。夫断代分期，皆为著书之便；而星霜改换，乃天时运行之故，不关人事，无裨文风，与其分为上古、中古或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何如汉魏唐宋，断从朝代乎？”^① 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② 无疑，在由古及今的过程中，文学史需要将大量的文学现象进行梳理，在其整合的标准、方式、秩序中，时间线索是不可或缺的，王朝政治史显然是可供借鉴的典型坐标。文学虽有独立性和独特性，但和社会至少还有藕断丝连的关系，朝代更迭作为社会大事，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若说没有关联，那肯定是陷入了绝对的误区中。“依王朝的更替来划分文学史段落，不仅用于断代文学史，即在文学通史的编撰中，也一直沿用下来，目前似乎尚无公认的更好办法可以取代它。”^③ 郑振铎

① 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见《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第481~482页。

②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页。

③ 董乃斌：《唐代文学史的编撰：历史与现状》，《学术研究》2001年第3期，第90页。

早在1958年就曾撰文指出，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原则“是和一般历史的发展规律相同的”，“是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步调相一致的”^①。文学史作为历史的一个分支，和历史的变迁保持一致性不仅未尝不可，而且也是目前为止更为广泛接受且符合传统认识的分期方法。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曾指出：“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的。”^②可见王朝分期法不仅常见于中国，也出现于各国的文学史中。

以王朝（政治）作为分期方法，在文学史编撰过程中，通行范围最为广泛，时间最为久远，但其面临的反对意见也是最多的，早在中国文学史写作大潮产生之初就遭遇过批评。郑振铎评论翟理士《中国文学史》时就说书中的王朝分期框架导致“不能详述文学潮流的起迄”。钱锺书则认为，按政治朝代对文学史进行分期“有如匡格”，且文学发展“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③20世纪后期反对声更为明显和集中。刘毓庆说：“但这三分期，无论哪一种，都是不科学的。第一，谓‘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而不是指某一历史阶段的文学。这样按政治社会史的阶段去分割文学史显然是文不对题的。第二，将文学的历史，按朝代或者按社会形态去割裂，只能将一个系统的东西，弄得支离破碎，而无法去揭示它的内在发展规律。”^④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一书中对这种分期方法表示了不满：“中国文学史本应当是‘文学’的历史，可是，传统

① 《郑振铎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76页。

②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303页。

③ 钱锺书：《谈艺录·诗分唐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3页。

④ 刘毓庆：《中国文学史分期刍议——兼论文学史的编写》，《中州学刊》1987年第5期，第73页。

史学对于历史的叙述，却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对于学术史的描写也以经学为中心，而这种习惯不自觉地就被人带到了文学史里：王朝之分可以代表文学史的分期，对文学史的叙述判断，要放在对以经学为核心的学术史所做的判断和叙述的大前提下。”^①也有学者指出，在文学史的编写上，存在“文学史自主品格的失落”的问题，表现之一就是“划分文学史的分期时，常常把社会发展的阶段或政治体制的变动（乃至领导人的更替）完全等同于文学发展的分期”^②。孙明君对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进行评价时指出，该书试图从人性的角度来探讨文学规律和分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但“遗憾的是，像过去的文学史著作一样，章编文学史分期的标准依然是取决于王朝的更替，而不是依据文学自身的嬗变规律”^③。从这样的遗憾中可以看出，作者也希望从文学自身出发确立文学史的分期。

在对王朝分期方法的反对声中，大多数学者都表达了希望从文学本体出发进行文学史分期的设想，这也就可以作为文学史分期的第三种方法。但似乎也不能同历史分期截然撇开。还有一部分学者发表了相对比较折中的看法，并不完全排斥王朝历史分期方法，但希望以文学自身的发展为主导因素。钱锺书指出：“夫文学史之时期，自不能界域分明，有同匡格；然而作者之宗风习尚，相革相承，潜移默化，由渐而著，固可标举其大者著者而区别之。”分期不如“界域”“匡格”，没有绝对固定的方法，但可以文学风尚的

①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32页。

② 陈建华：《关于“20世纪俄语文学史”的新架构》，李明滨、陈东主编《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8页。

③ 孙明君：《追寻遥远的理想——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回顾与瞻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54页。

递嬗为参照，而“断代分期，皆为著书之便”。^① 唐弢认为：“文学史的分期应当根据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来分，至少应该根据文化发展或者思想发展来分，可以参考历史分期和政治分期，但不一定去生套硬凑，一定要跟政治分期一样。”“文学史的分期同历史分期有关系，但并不完全一样……”^② 虽然章培恒版《中国文学史》依然难以摆脱按照王朝更替的分期方法，但其依然主张“文学史的分期到底应以文学本身为基础，所以，文学史的分期与一般的历史分期只能是若即若离的关系，而不应是亦步亦趋的关系”^③。卞荣本具体指出：“社会史的发展，文学观念的变革，文体的流变，是文学史分期参照的主要方面。”^④ 钱志熙对从严羽到高棅的《唐诗品汇》的前后相继，最后所确定的关于唐诗初盛中晚四期的分期理论，认为其“合理性在于不是简单地从历史分期为文学史（分期）借来一个外壳，而是真正能够展示唐代诗歌发展趋势的科学的分期”^⑤，既强调了文学自身发展趋势与确立分期原则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并不排斥历史分期的“外壳”作用。可见，按照王朝更迭划分文学史的分期虽然在操作上为文学史家提供了便利，但对于真实再现文学发展原貌、符合文学发展事实的文学史客观性建构仍存缺憾。那么，如何在文学史的撰写中，尽最大可能使书写的分期向文学的客观真实靠拢呢？

方法和思路简单可以划分为上述三种，但似乎落实到具体写作之中，统观现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基本都采用王朝政治史的分

① 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国风》半月刊第三卷第八期，1933年10月16日。本文所引见《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第480~482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内部刊行），1986年第1期；《唐弢文集》第九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第488~491页。

③ 章培恒：《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第110页。

④ 卞荣本：《论文学史的分期》，《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34页。

⑤ 钱志熙：《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第23页。

期方式，试以两种应用最为广泛的文学史著作为例进行说明。

游国恩版的《中国文学史》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编写的、通行时间最长的一部文学史，在开篇说明中，编者这样写道：“本文叙述上古至‘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学，即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部分。至于分期，目前史学界尚有争论，有些同志虽然提出了一些新的分期办法，实际上做起来也有些困难，因此，我们仍按照北京大学一九五五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分全书为上古至秦统一的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近代文学——晚清至‘五四’的文学等九编。除末编按社会形态划分外，其余则基本以主要封建王朝作为分期的标志。在我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发展中，封建王朝的更替，往往是长期阶级斗争的自然段落，它或多或少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若干新的特点，它也对文学的发展起制约作用，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因此，尽管以主要封建王朝作为分期标志，不是严格的科学划分，但它也有助于我们掌握我国文学的发展，我们还是采用了这种办法。”^①

通过上述说明，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书写文学史时关于分期方法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思考。首先，分期问题是《中国文学史》作者在动手之初就非常重视的问题，所以在说明该书的创作背景和思路之中，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来解释他们对于分期的认识、争论以及决定。其次，权衡之下，最终主要采用以封建王朝作为分期标志的方法。这并不能证明它是完美的，因为作者很明确地表示王朝分期法“不是严格的科学划分”，但是它一定具备合理性——“在我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发展中，封建王朝的更替，往往是长期阶级斗争的自然段落，它或多或少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若干新的特

^①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第2页。

点，它也对文学的发展起制约作用，影响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最后，也正因为这种矛盾，所以作者先行强调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虽然有分期的“束缚”，但也不能完全受制于其中，而是要重视文学的本真，尽量勾画文学发展的原貌，“同时还注意到各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和相互影响，以及它们的源流源变”^①。

文学史作为—个学科，书写将近百年，随着讨论越来越深入，文学史的编写者在实际操作中进一步展开打破王朝政治分期的种种尝试。袁行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采用了“—古七段双视角”，并自述：“和现在通行的分期法相比，—个重大变化就是打破朝代的局限，完全从文学本身出发，以文学本身的发展阶段作为文学史分期的根据。”所谓—古七段双视角也即—古七段法：上古期大约为3世纪以前的时期，包括先秦和秦汉两段；中古期为3世纪至16世纪，包括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唐中叶至南宋末、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三个阶段；近古期为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包括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和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两个阶段。按照编者的说法，这种分期方法“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背景”^②，可见作者是希望运用更为客观、更为全面的方式考虑分期问题的。游版是“努力依照各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勾画出它们的面貌”，强调时代；袁版则是“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分期观念的立足点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另外，笔者还注意到，在秦汉文学的绪论部分，编者专门就“汉代文学的分期”问题进行了说明，将汉代文学

①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第1页。

② 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总绪论第12页。

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自高祖至景帝的初创期、从武帝至宣帝的全盛期、从元帝到东汉和帝的中兴期和从安帝到灵帝的转变期，举出各个时期的文体发展情况和代表作家。但是在其后的正文撰述中，则是分列七章：秦及西汉散文、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司马迁与《史记》、两汉乐府诗、东汉辞赋、《汉书》及东汉散文和东汉文人诗，基本是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按照文体的分类进行秦汉两代文学史编撰的。可见文学史分期的处理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袁行霈在该版文学史正式出版十五年之后，撰写了一篇文章继续表述自己的观点：“中国文化史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的坐标，一个是地域的坐标。时间坐标的确立，分期是关键。理想的分期法是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不必完全按照朝代更迭来进行。”“面对悠久的中国文化，分期是研究和描述其历史发展的关键。学术界习惯按朝代划分时期，即将朝代的更替作为分期的界限，这自有其学理的根据。就学者个人而言，专攻一个朝代的历史文化，也是很自然的。然而，改朝换代乃是政权的转移，适合于政治史，是否适合作为文化史分期的依据呢？这是我长久以来不断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理想的分期法是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可以按朝代分期，也可以不按朝代分期，不可一概而论。”^①

古代文学史之外，一批现当代文学史著作，诸如谢冕的《百年文学中国史总系》、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黄万华的《中国和海外 20 世纪汉语文学史论》等在时间的处理方式上，尝试放弃分期的模式，转而以某些时间点或时间段为切入视角，将与其相关的社会事件与文学事件进行剖析。但因为以时间点为切入，所以

^① 袁行霈：《我的中国文化时地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2页。

叙述视野的广度和陈述对象的选择上有局限，而以时间段为切入，时间段的实质也是由时间节点构成，而节点正是分期的基本要素，所以文学史家在面对书写的时间思维上面的选择其实非常有限。

“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从初创到如今已有百年历史，从林林总总的理论到红红火火的实践，至今仍然没有发现一个能有效贴近文学史客观性的历史分期方式。那么，我们不妨转换视角，回视中国古代传统文学史书写的分期实践以及思路。

四 传统文学史书写中分期问题的研究意义

关于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从 20 世纪初期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教材编写，已延续了百年且热度不减。20 世纪末，“九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文学史学史研究”获准立项。项目组成员陈伯海提出，鉴于“学术界发出的建设中国文学史学的呼声”，“要求对文学史工作自身进行理论检讨”，“在大量的文学史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原则”，这其中就包括“分期与分段”等问题，这些都是“明确归结于文学史学的理论建构”的，标志着文学史工作者自觉意识的抬头。^① 2001 年，《复旦学报》开辟专栏——“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章培恒和陈思和两位主持人，分别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学科带头人，可见这个专栏的开辟不同于“重写文学史”的专栏，而是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研究领域。他们在开篇语中首先强调了文学史分期的必要性，“为了展示文学的演变，我们必须把它的发展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这些阶段在文学上应各具首尾贯穿的特色，而在前一阶段与后一阶段之间则应在文学上有其分明的断限”，并且明确批评了“以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习惯以朝代

^① 陈伯海：《中国文学史学史编写刍议》，《社会科学战线》1997 年第 5 期，第 56 页。

分期”的传统思维模式。^① 但其后所发表的论文，“大多数是围绕着 20 世纪百年文学而展开，而古代文学的分期问题除了有个别的学者提出‘近世文学’的概念外，没有进一步涉及”。^②

也有部分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学史的科学性提出质疑，黄仁生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绪论》一文中从设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方向的论点入手，谈及中国文学分期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理由有二。其一，“中国文学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即使按照前面提到过的约定俗成的分法，以 1917 年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为界，此前的三千年文学，从整体上视之为‘古’；此后九十余年的文学，从整体上视之为‘今’。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因时间跨度过于久远（尤其是古代文学），不便于把握其演进的特征，有必要进一步对中国文学史进行分期”。其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作为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固然可以覆盖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学，但并不是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简单相加，而是着重强调以一种古今联系的视角和方法，对中国文学作整体性的观照和贯通性的研究。为使这种观照和研究具有可操作性，也有必要就中国文学发展史进行分期”^③。然而，对于传统文学史书写中关于分期问题的实践与思想，黄先生却甚为轻视，认为“一是说得简略而随意，二是多以时代升降而溯源探流”，并举出叶燮、胡应麟、王国维等人的文学史书写事例，用以证明古代文学史家既“无意撰写文学史”，又无“科学的研究”，故而对现代文学史意义上的文学史书写分期问题毫无价值。

依托现代科学体系建立起来的文学史学科，对于中国文学发展

① 章培恒、陈思和：《〈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主持人的话》，《复旦学报》2001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② 罗兴萍：《文学史分期与文学观念的演变》，《复旦学报》2002 年第 6 期，第 17 页。

③ 黄仁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绪论》，《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9 年第 5 期，第 79 页。

历程的书写，在实践中偏离了那种更为重视文学本身、重视个人感受、符合中国文学发展脉络的传统经验，虽然文学史著述汗牛充栋，但总是不尽如人意。由此追本溯源方能返本归真。何为本？就是先唐时期的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家在具体书写过程中，在时间观念的指引下，选择时间节点时或者是朝代、统治者或者年号等多种方法，也会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引领一个时期，其灵动自由远超现代人书写的想象，更非统一体例的教材可以比拟。故而回归初心，从文献资料中爬梳出具有文学史书写性质的材料^①，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考察对于之前发生的文学现象以什么为依据来划分阶段进行论述，又以什么为时间节点领起对于一个时期的文学阐述，析其理念，探其方法，分析具体的分期实践，总结出分期的思想，以期于今有所借鉴启迪。因为一个节点必须对应两个阶段，而历史需要连贯的发展，所以能够设定一两个时间节点作为某一文体或者文学现象的分期就具有书写的鲜明价值和历史意义，即便每个阶段的书写方式未能达到统一，也已经具备时代特色的研讨意味，即可纳入文学史书写分期问题的探讨之中。同时，为了叙述方便，还是采取时间先后顺序，结合史家的生辰和史书创作的时间。基本以时间先后为序，因为同一时间文学的发展也在经历自觉的发展阶段，所以很难界定纯粹的文学属性，因此关于文学史的书写范围也只能相对宽泛。

第二节 两汉文学史家的分期 实践及思考

在汉代以前的文献中，从时间流动和比较的角度，很难看到对

^① 鉴于早期学术史诗乐舞、文史哲不分的状况，纯文学观念也在形成之中，所以早期文学史书写探讨包含了学术史的内容。

于前代文学发展的梳理和记载，难以涉及书写的分期问题。到了汉代，从现存资料中慢慢可以发现，文学史家能够将时间观念和文学发展逐渐结合进行历史的思考。究其原因，就是本书第一章第一节，文学史书写的相关范畴和背景所介绍的，一方面在于历史意识发展下的史学独立、文学的自觉引发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史书写的大量增加，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史多角度多层面的结合。

本节以两汉为时间断限，从史料中搜索在文学史书写上涉及分期问题的典型材料，包括西汉四篇和东汉的十三篇，通过介绍作者的基本情况，交代选文的创作背景，通过具体的文本内容分析，考察书写内容的分期节点，归纳分期方法，在其书写实践基础上总结其分期思想，寻求文学史家在分期问题上的创新成果，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一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

董仲舒（约前 179~前 104），广川（今河北景县）人，西汉儒家今文经学大师，景帝时任博士，精治《公羊春秋》。武帝时以贤良对策，其“天人感应”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曾任江都王和胶西王相，后托病辞官，专心修学著书。著有《春秋繁露》，明人辑有《董胶西集》。

汉武帝即位以后，多次要各地推举贤良和文学的人才参加对策。董仲舒获此殊荣来到朝廷，汉武帝策问三次，董仲舒对策三次。这三次对策文字，就是《举贤良对策》。汉武帝策问的目的是寻找治国方略，董仲舒的思想恰好能够维护和巩固汉武帝所需要的集权统治的历史要求，所以即刻吸引了汉武帝的关注并使其之后更大力度地推行。同时《举贤良对策》中也体现了董仲舒的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比如礼乐和道的关系：“道者，仁义礼乐

皆其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教化立而奸邪皆止”等。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禹、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闾天、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①

董仲舒在谈及时代和君主以及社会的关系时，将历史进行了明确的分期，按照朝代和统治者为标准，举出尧、舜、殷纣、文王四个阶段，但其主要着眼点在于指明不同君主所造就的不同时代、社会态势和文学史关系不大。但是在另外一篇《春秋繁露·楚庄王》

^①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中华书局，1962，第2508~2509页。

中，他主张乐的教化功能在于歌功颂德，而且作乐始于本，根据时移世易，乐的内容和功能都会有所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对于早期文学、音乐以及哲学、历史混杂的现象而言，主张音乐的教化功能和时代性也是在表达作者对于文学的认识，所以也可以看作作者的文学史观念表达。恰好在表达这一思想时，我们可以发现其也加入了按照统治者进行分期的思想。

问者曰：物改而天授显矣，其必更作乐，何也？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盈于内而动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护》。“护”者，救也。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一也，其所同乐之端不可一也。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汤作《护》而文王作《武》。四乐殊名，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吾见其效矣。《诗》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乐之风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当是时，纣为无道，诸侯大乱，民乐文王之怒而咏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为乐，谓之《大武》，言民所始乐者武也云尔。故凡乐者，作之于终，而名之以始，重本之义也。由此观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

二者离而复合，所为一也。^①

董仲舒先后举出舜、禹、商汤和周文王四位明君，由于“昭尧之业”“三圣相继”“救之于患害”“兴师征伐”等重大政治举措深得民心，故百姓为之兴乐《韶》《夏》《护》《武》。“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四部乐舞名称不同，正是因为“乐不同事”，故乐有所异，“各顺其民”。

二 孔安国《尚书序》

孔安国，生卒年不详，西汉经学家，孔子第10世孙。武帝时任博士，官至谏大夫。武帝末年，鲁共王坏孔府旧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数十篇，皆古字，无人可识。孔安国整理后谓之《古文尚书》，又奉诏作书传。另著有《古文孝经传》和《论语训解》等。

到了汉武帝时期，学者们从整体的学术思考逐渐开始进入对具体门类的单独思考，这其中就包括“文”。孔安国《尚书序》的入笔就在于回顾古代文献的产生过程，他自然地引入四个时期，选择统治者作为时间节点：“伏羲氏”“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高辛、唐、虞”“夏商周”。这四个阶段代表古代文献发展的四个时期，并皆有自己的代表文献和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史书写基本效仿这个思路。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楚庄王第一》，中华书局，1992，第19~23页。

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①

孔安国另有《古文训传序》论及《孝经》的成书背景以及流传情况，也具有明显的分期思路：“逮乎六国，学校衰废”，“及秦始皇焚书坑儒，《孝经》由是绝而不传也”，“至汉兴，建元之和，河间王得而献之”。

《孝经》者何也？孝者，人之高行，经，常也。自有天地人民以来，而孝道著矣。上有明王，则大化滂流，充塞六合。若其无也，则斯道灭息。当吾先君孔子之世，周失其柄，诸侯力争，道德既隐，礼谊又废。至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乱逆无纪，莫之能正。是以夫子每于闲居而叹述古之孝道也。夫子敷先王之教于鲁之洙泗，门徒三千，而达者七十有二也。贯首弟子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性也，至孝之自然，皆不待论而寤者也。其余则悻悻愤愤，若存若亡。唯曾参躬行匹夫之孝，而未达天子诸侯以下扬名显亲之事，因侍坐而咨问焉，故夫子告其谊。于是曾子喟然知孝之为大也，遂集而录之，名曰《孝经》，与《五经》并行于世。逮乎六国，学校衰废；及

①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第一·尚书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8页。

秦始皇焚书坑儒，《孝经》由是绝而不传也。^①

三 刘向《战国策录》

刘向（约前77~前6），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历任散骑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是我国目录学之祖。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著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三十三篇。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刘向奉命整理《战国策》一书并为之作序，清晰交代了《战国策》一书形成的历史背景，侧重说明因为时代不同，礼乐教化、纲纪道德都会随之发生很大变化，设置“周（文武）”“春秋”“春秋之后”“秦”四个时间节点用以分期。其中，“周”又分成“文、武始兴”和“康、昭之后”，前者“崇道德，隆礼义”，后者已经“衰德”。春秋也以“五伯”分界，前期“尊事周室”，后期“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整体维持“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的美好盛世。春秋之后（战国）“礼义衰矣”，具体则以“仲尼”区分，生前“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身后“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于秦国，仁义更弃，道德绝矣。从秦孝公开始，至其晚世，再至始皇、二世，更是“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

叙曰：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

^①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十三·古文孝经训传序》，中华书局，1958，第195~196页。

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弟之义，惇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四十余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

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

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因而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亲，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杖于谋诈之弊，终

无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①

四 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

刘歆（？~23），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刘向之子，西汉末经学家、目录学家、天文学家。刘歆以能通经学、善属文为汉成帝召见，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协助校理图书。建平元年（前6），刘向卒，他复任中垒校尉，被大司马王莽举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复总领五经，继父未竟之业，部次群书。哀帝继位后，刘歆在刘向所撰《别录》的基础上，依其体例，更著为《六略》，又叙各家源流利弊，总为一篇，谓之辑略，以当发凡起例，总名为《七略》，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著录图书13219卷，其分类体系对后世影响极大。此后，南北朝宋王俭《七志》、梁阮孝绪《七录》、隋许善心《七林》、宋代郑寅《七录》，均采用七分法。该分类法盛行于东汉，

^①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三十七·战国策书录》，中华书局，1958，第331页。

东汉编修的宫廷藏书目录如《兰台书部》《东观新记》《仁寿阁新记》均以《七略》为蓝本。原书已佚，主要内容保存于《汉书·艺文志》，从中可窥其全貌。

作为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移书让太常博士》虽然直面古今文之争，但它首先肯定了孔子与六艺的关系，并且总结了六艺在不同时期的境遇，颇似唐虞三代至西汉末年的文化发展变迁史。第一个阶段，始自“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以“道”为著，而“周室既微”之后，“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于是孔子正《乐》《雅》《颂》，修《易》，序《书》，制《春秋》，“以纪帝王之道”，这是第二个阶段。其后“重遭战国”，“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至于暴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这是第三个阶段。汉兴之后七八十年，初有叔孙通“略定礼仪”；“孝惠之世”，“除挟书之律”；孝文皇帝使晁错“从伏生受尚书”，“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再待孝武皇帝之时，“诗礼春秋先师”，这是第四个阶段。

刘歆选取的时间节点包括“唐虞”“三代”“周”“战国”“暴秦”“汉”“孝惠”“孝文”“孝武”，我们发现随着汉朝统治的年代增加，由不同君主的政策所带来的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差别，由此表示不同阶段的时间节点在传统的朝代名称和君主统治者的称谓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统治者的谥号。

作为君主逝后，根据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给予评判的称呼，谥号、谥法制度始自西周。早在《逸周书·谥法解》中就有周公制谥的提法：“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攻于牧野之中，终葬，乃制谥叙法。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小名；行出

于己，名生于人。”^① 因为周公旦和姜子牙有大功于周室，所以在死后获封谥号，这是谥法之始。《周礼》也说“小丧赐谥”，在死后一段时间之内获赐谥号，基本是一个意思。又有学者提出“周文王”和“周武王”是自称不是谥号，“周昭王”和“周穆王”才开始是谥号。近代以来又有学者根据金文考释认为这一制度形成于恭王和懿王阶段（即周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时期），因为时代久远难以定论，但谥号形成于西周时期的说法是没有疑问的。谥法制度在周王室和春秋战国的各国之间被广泛施行，并延展到王、公、卿、大夫（自汉代起则是皇帝、大臣、亲贵、士大夫）等，其中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由即位皇帝宣布，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但秦始皇认为后人给先辈评定褒贬有不尊的意味，因此废除了谥法制度，直到西汉建立之后才得以恢复。汉代倡导孝治天下，所以皇帝的谥号都带有孝字。刘歆在这篇《移书让太常博士》中以谥号作为时间分期的节点，为后世开启了一个新的方法，很多的书写者都会在朝代之内，借用统治者的谥号来划分不同的时间阶段。

谥号之外，还有庙号。庙号本来并非所有皇帝都会获得。古代有“天子七庙”的说法，其意为天子只能敬奉上数七代祖先，如果祖先有庙号就可以代代保留其庙，否则就只能寄存在别的庙里，所以并非每一朝的每一个皇帝都有庙号。庙号多为“祖”“宗”等，其中“祖”多是开国或者曾有保全社稷的特殊功绩的皇帝。西汉皇帝的庙号情况有史记载：“祖宗之庙世世不毁，继祖以下，五庙而迭毁。今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孝武皇帝为穆，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为昭。皇考庙亲未尽。太上、孝惠

^① 黄怀信、张懋镠、因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六·谥法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623~627页。

庙皆亲尽，宜毁。太上庙主宜瘞园，孝惠皇帝为穆，主迁于太祖庙，寝园皆无复修。”^① 庙号的设定基本以唐朝为界，之前或有，之后均有，但汉朝已经是一个集中出现庙号的时期了，史家及时地把握了这一历史节点的变化，将其纳入了分期方法之一。

此外，这篇《移书让太常博士》中还出现了新的分期节点——年号。“建元”（前 140~前 135）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是西汉第五位皇帝汉武帝刘彻的年号，总共使用时间为六年。刘歆在统治者谥号的基础上，加上年号来将时间凝固在更为精准的一个阶段，对于文学史分期的处理方法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不仅是后世普遍采用的分期方法，并且尤其对于统治时期长的朝代来说，更有利于将社会发展同文学发展的不断变化相结合，更为同步地体现文学史的进程。章太炎曾说：“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② 他认为古往今来学术成就上孔子第一、刘歆第二，以证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高超地位。那么在传统文学史的书写范式方面，具体到文学史分期处理方法，尤其是节点的选择，谥号、庙号、年号都在刘歆这里完成了，后人基本因循这个思路进行书写。也就是说，学术史分期的基本方法（节点），在西汉末年就已经出现且确立，刘歆的功绩一锤定音。

五 班彪《史论》

班彪（3~54），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西汉末年为避战乱至天水依附于隗嚣，作《王命论》探讨王政更替的“天命”及道德基础，欲图感化隗嚣归附汉朝，未果，转而至大将军窦融处劝其支持刘秀。东汉初，举茂才，拜为徐令，后因病免

① 班固：《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第四十三》，中华书局，1962，第3120页。

② 《章太炎全集·楹书重订本·订孔第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135页。

官。班彪“才高而好述作”，“专心史籍”^①，有志于续写《史记》，未就。其子班固、其女班昭继承其业，续成《汉书》，史料多依其生前整理。

班彪从书写历史的体例和原则着眼，作《前史略论》，简要追述汉以前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价司马迁的成败得失，代表儒家正统史学观点，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杗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杗杌》之事遂暗，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

^①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第三十上》，中华书局，1965，第1324页。

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①

关于史学的起源，班彪和班固父子的思考比较早，而通过考察班彪对于历史书写的缘起与发展经过，可以发现他也是采用设置时间节点的方式，包括“唐虞三代”“定哀之间”“春秋之后，七国并征，秦并诸侯”“汉兴定天下”“孝武之世”等五个时间节点，并举出代表这五个时期的史学成就。同时我们发现，在班彪的理解中，史书也是产生于唐虞三代之际，和前面资料中提到的多种学术史非常相似，这是历史的共识，也是史家的共识。

同时，须特别指出的是，班彪在处理历史分期的问题时，采用了一个崭新的时间节点“定哀之间”^②，“定公”和“哀公”都是谥号，前面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已经将谥号、年号都作为时间节点，但是这里更为灵活的是将两个谥号之间作为分期标志，其背后的原因是，史家书史并非严格按照朝代或者君主分期，而是尊重学术的客观发展情况，尊重学者的学术进程。

鲁定公和鲁哀公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两位君主，二人系父子关系。鲁定公，姬姓，名宋，承袭兄长鲁昭公担任鲁国君主，在位十五年。鲁定公在位期间，大权被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三家控制，他无异于一个傀儡，所以当他听说孔子开坛讲学，主张“君君臣臣”以及“仁政”等思想后，就召见孔子，一同分析鲁国的内忧外患。孔子建议他向外联和齐国，对内重振君威，并陪同他参加

① 范曄：《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第三十上》，中华书局，1965，第1325页。

② 其实早在《公羊传》中就有这种说法，《史记》中也是，但其仅用于历史节点，而非学术史的角度，故同班彪的意义不同。见“定公四年”：“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见《史记》“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齐鲁两国的“夹谷之会”：“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齐侯惧，乃止，归鲁侵地而谢过。”此后，鲁定公对孔子更加信任，封其为大司寇。孔子终于获得机会推行政治主张，但好景不长，仅仅两年，就受到当权大臣的阻挠而被迫离开鲁国：“十二年，使仲由毁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去。”^①十五年，定公去世，儿子姬蒋即位，即鲁哀公。鲁哀公和孔子之间的关系，见于《荀子》的记载。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问，圣君之问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无所闻之也。”孔子曰：“君入庙门而右，登自阼阶，仰视榱栋，俯见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则哀将焉而不至矣！君昧爽而栉冠，平明而听朝，一物不应，乱之端也，君以此思忧，则忧将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听朝，日昃而退，诸侯之子孙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劳，则劳将焉而不至矣！君出鲁之四门以望鲁四郊，亡国之虚则必有数盖焉，君以此思惧，则惧将焉而不至矣！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②

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孔子去世，鲁哀公亲谏孔子。谏文说：“旻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莝余在疚，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中华书局，1959，第1544页。

② 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三十一·哀公》，中华书局，1979，第500页。

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左传·哀公十六年》）可见孔子的一生和这两位鲁国君主关系密切，而孔子的一生有足以影响后世的学术思想史，所以“定哀之间”也成为后世书史时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①。

六 刘苍《世祖庙乐舞议》

刘苍（？~83），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汉明帝刘庄同母弟弟。“少好经书，雅有智思”。建武十五年受封为东平公，十七年进封爵为王。明帝永平元年，拜为骠骑将军，位在三公之上。刘苍所著章奏、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多篇，有集五卷。

早期中国学术混杂，诗乐舞、文史哲难以截然分开，而在汉代相继出现了书史的文章，并非巧合。根据汉代经学的一般观点，为显示在位时的德治天下，皇帝会派专人制作宗庙礼乐，正所谓“歌所以咏德，舞所以象功”，汉朝历代君主设立宗庙乐的意义即在于此。为了彰显其父光武帝刘秀庙乐舞的价值，刘苍梳理了中国统一政权后庙乐舞的发展，即秦汉两代的情况。对比之下，秦朝失德无道谈何乐舞。西汉则举出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三位堪有德治之功的君主。从这篇文中可以看出，其所采用的已经是通过君主谥号来代表一个时期的方法。

汉制旧典，宗庙各奏其乐，不皆相袭，以明功德。秦为无道，残贼百姓，高皇帝受命诛暴，元元各得其所，万国咸熙，

① 如《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列传二百六十七·儒林一》也有“定哀之间”的时间节点：昔周公制礼，太宰九两系邦国，三曰师，四曰儒；复于司徒本俗联以师儒。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分合同异，周初已然矣。数百年后，周礼在鲁，儒术为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与艺合，兼备师儒。颜、曾所传，以道兼艺；游、夏之徒，以艺兼道。定、哀之间，儒术极醇，无少差缪者此也。荀卿著论，儒术已乖。然《六经》传说，各有师授。（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第13098页。）

作《武德》之舞。

孝文皇帝躬行节俭，除诽谤，去肉刑，泽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开地置郡，传之无穷，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武畅方外，震服百蛮，戎狄奉贡，宇内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肃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乱，武功盛大。歌所以咏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庙乐舞名，宜曰《大武》之舞。^①

七 许慎《说文解字序》

许慎（30~124），字树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性淳笃，少博学经籍”。曾举孝廉，后迁除洹长。主要著作有《说文解字》和《五经异义》。

许慎《说文解字序》首先阐述文字的源流、演变以及研究情况，其次针对后汉尊崇隶书反对古文的问题，分析传统六书，讨论古文的价值。而第一部分内容即相当于为文字书史。许慎选取的时间节点包括“庖牺氏”“神农氏”“黄帝之使仓颉”“五帝三王之王”“七国”“秦始皇”“汉”“孝宣皇帝”“孝平皇帝”“亡新”，以领起文字发展的不同阶段，君主、朝代、谥号同时出现并作为分期的方法。具体而言，该序言将文字的历史分为九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庖牺氏作八卦。八卦最早用于占卜，《淮南子》《易》《尚书序》中均对庖牺作八卦有提及，但并没有将其与文字的起源联系在一起，许慎在此将其作为一种具有表达意义的书面符号，是为文字

^①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十·世祖庙乐舞议》，中华书局，1958，第525页。

起源的初始阶段。第二阶段是神农结绳。人类学资料和其他考古证据表明，在文字出现之前，结绳是人们用来记录的普遍方法。新石器时期以来的陶器刻画资料上出现的许多文字都有着结绳的痕迹，如金文中的“卖”字。《老子》《庄子》中关于这一问题也有所记述，但许慎将其明确为文字发展的第二阶段。仓颉造字是为第三阶段。作为黄帝史官的仓颉，奉命造“书契”：“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着于竹帛谓之书”。仓颉对于文字历史的贡献，被广为认可。《吕氏春秋·君守》里有“仓颉作书，后稷作稼”，《荀子》《韩非子》《淮南子·脩务训》等战国秦汉书籍都有所记载。第四阶段是三王五帝阶段。虽然没有具体史料证明，但许慎根据历史进化论的观念，认为从黄帝初造书契到周代大篆定型，其间文字不会凝固不前，故而设定这一个时期。古人对于君主推进文化学术前进动力的认识也由此可见。第五个阶段是西周末年周宣王时期，根据《周礼》记载，其时已有六书的造字和用字之法，太史籀奉命“著《大篆》十五篇”，又称“籀文”，但普及性不强，孔子、左丘明等人依然使用古文进行书写。第六个阶段是“七国”，此时“文字异形”，没有什么发展。第七个阶段是秦始皇执政期间，先是小篆得以创制，后有隶书兴起，“古文由此绝矣”。第八个阶段是汉朝，首先“兴有草书”，进一步丰富了汉字字体；其次通过“孝宣”和“孝平”两个谥号，介绍不同时期文字作为修习考试内容的不同情况。最后，第九个阶段是王莽的“亡新”政权时期，由秦代产生的“八体”演变为“六体”。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

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汉兴有草书。尉律：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

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力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①

八 班固《礼乐志》

班固（32~92），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班彪之子，字孟坚，汉族，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东北）。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潜心二十余年，修成《汉书》，当世重之，迁玄武司马，撰《白虎通德论》，征匈奴为中护军，兵败受牵连，死狱中，善辞赋，有《两都赋》等。

班固《汉书》设有十志，其中《礼乐志》和《艺文志》都和中国早期文学息息相关，对于文艺的历史发展情况都有涉及，不仅是非常重要的资料，也是具有鲜明特征的学术史书写实践。《礼乐志》是《汉书》志的第二篇，通过论述礼、乐的性质和作用，追溯其历史，从而对汉代礼乐制度建设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进一步

^① 许慎：《说文解字·第十五上》，中华书局，1963，第314~315页。

阐述了礼乐与王道的兴衰有密切关系。《汉书》相比《史记》，虽有《礼志》和《乐志》，但《礼志》介绍了礼的特征和沿革，却和学术关联甚少；《乐志》效仿《礼记·乐记》，几无所创，亦和学术发展关联甚少，故而班固的创新性更具价值。

班固从《六经》说起，“礼”和“乐”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可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又引用孔子之语“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继续阐释礼乐的功效：礼能节制百姓的思想，乐能调和百姓的声音，用政令来实行它，用刑法来防患它，由此王道行之。顺着这个思路，班固进一步强调礼和乐的一体性质：“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二者并行，合为一体。”阐明了礼乐的价值之后，班固就开始回顾“礼”在两汉的历史了。

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

至文帝时，贾谊以为“汉承秦之败俗，……狱讼衰息”，乃草具其仪，天子说焉。

至武帝即位，进用英俊，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会窦太后好黄老言，不说儒术，其事又废。后董仲舒对策言……是时，上方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

至宣帝时，琅邪王吉为谏大夫，又上疏言……。上不纳其言，吉以病去。

至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说上……。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谥。

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因以篡位，海内畔之。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改定京师于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乃营立明堂、辟雍。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①

暂且不论班固对于汉代“礼”的态度和行动，仅仅从叙述方式上来看，明显根据君主分期，大多以谥号为代表，这一分期方法已经非常明确和清晰了。

说完礼，来观乐。班固对于“乐”的历史梳理，视野和思维相对复杂，非如“礼”般只谈汉代建制，而是从远古说起，因为政权并未统一导致代际相对杂乱，但大致的时间分期还是比较明显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来，纵使如班固之大史家，在当时书写历史的写作过程中，对于分期的处理，尚难以固定一个明确的标准和方法，非如“礼”般只谈汉代建制。大体而言，汉代以前分为两个时期。首先，引出五帝和商周领导者的代表制乐，肯定其“教化百姓、说乐其俗”以及经过改造之后“以张功德”的作用，并通过事例来印证。其次，到了周朝时，因为失道，“怨刺之诗起”，礼乐逐渐丧矣。汉朝之后，形势出现反转。高祖时命令叔孙通依照秦人记忆制造宗庙的音乐，其后惠帝、文帝、景帝、武帝、宣帝都有所为。同时制礼作乐的机构逐渐形成，其缘起于高祖返乡时“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孝惠帝时即以“沛宫为原庙”常常组织唱和，文景之时“礼官”基本维持现状，武帝时先定郊祀之礼后立乐府，又

^① 班固：《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二》，中华书局，1962，第1030~1035页。

用李延年、司马相如等人，渐成规模。以上是汉朝最高统治者在制乐方面的举措，在地方上还有河间献王搜集雅乐所做的贡献。河间献王刘德与武帝刘彻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虽然因此受到排挤，但他的举措与汉武帝共同成就了这一时期的乐制。到了成帝时，河间献王的功绩终于得以显现，宋晔上书言其师父谒者常山王禹世代传授献王整理的雅乐，博士平当奉命调查后认为雅乐确能“兴助教化”，但因为公卿大夫的质疑而未能得以重视。到了哀帝时，有感于“世俗奢泰文巧”，又“性不好音”，所以采取了一系列清理郑卫之音的行动，但“百姓渐渍日久”，加之“不制雅乐”，故而难见效果，至王莽时彻底衰败了。西汉时期的乐制发展历程在班固的眼中，基本如上述之历史的发展，暂不论立场和结论如何，但史家的基本书写逻辑还是表现得非常清晰的，以君主为时间节点进行分期，一如前述。

《汉书》除《礼乐志》外，和文学最为直接相关的是《艺文志》，其《总序》一般被认为是先秦学术思想史，那么在书写范式方面，对于分期问题的处理方法是否和《汉书》其他章节保持了统一呢？大的时间断限是“战国”“秦”“汉”三代，具体到有汉一朝，又有“汉兴”、“孝武”和“成帝”三个阶段，分期的思路和方法一以贯之，非常清晰。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迨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

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①

具体到《六艺略》，其分期的范式也是一以贯之的。比如：“易”篇中的“殷周之际”“及秦燔书”“汉兴”“讫于宣、元”，“书”篇中的“至孔子”“秦燔书”“汉兴”“讫孝宣世”“武帝末”，“诗”篇中的“孔子”“汉兴”，“礼”篇中的“及周之衰”“汉兴”“讫孝宣世”，“乐”篇中的“自黄帝下至三代”“周衰”“汉兴”“孝文”“武帝”，“春秋”篇中的“周室既微”。还有《诸子略》中的《论语》《孝经》《小学》中也都出现“汉兴”这个班固眼中极为重要的时间节点，以及“武帝”、“元帝”、“成帝”、“宣帝”和平帝的年号“元始”。

这些“志”的体裁中涉及学术史的部分，若需要追本溯源就必然面临分期方法。除此之外在某些传记的“赞曰”部分，因为交代人物背景或者评价的需要，也会进行史的追忆，这其中也会体现史家的书写范式。比如班固在《司马迁传》文末撰写的赞，就有“自古”“孔氏（孔子）”“春秋之后”“汉兴”这四个时间节点。如果对照班彪《前史略论》，二者相似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主题都是为“史”书史。

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撰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

^①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中华书局，1962，第1701页。

颛项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①

本书第一章在介绍文学史家时，曾交代文学史家和史家的重合概率，班固是第一位以史学家和文学家并称的文人，因为他的创作文史兼备，既有正史，也有文学作品，而在文学创作之中，又包含了对作品体裁的历史思考，也就是以文学发展为对象的历史书写，这是足以彪炳史册的创举，其代表就是《两都赋序》。

《两都赋》是《文选》中“京都赋”类的首篇，然从文学史书写的角度而言，其意义在于班固在序言中提出“赋者，古诗之流”的观点，为赋这一体裁的历史变革和在两汉得以彰显的原因以及发展情况进行了明确的回顾，以及恰当的解释和分析，更为他下面的创作设定了合理的缘由。其中涉及赋这一文体源于古诗之后的发展脉络，班固选择的时间节点有“成康”“大汉初定”“武宣之世”“孝成之世”。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寢，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

^①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三十二》，中华书局，1962，第2737页。

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①

同时，自班固之后，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开始尝试书写历史，其身份逐渐从“纯粹”的史家群体向文学家群体转移，其原因也正如第一章所交代的，在史学独立和文史分离的背景下，文学发展渐趋独立带来文学家价值的增长。虽然从身份上来说“文学家”并非其主业，但是伴随着文学创作的增多，对何为文学的思考转而如何文学的思考，结合起来就是他们对文学的历史思考逐渐增多了。所以以班固为界限，侧重于文学家身份的文学史家的书写越来越多，文学史的书写亦越来越多，从而提供可参考的史料也愈发丰富并可互相参照。文学史书写的自觉，或可为“汉音魏响”文学自觉说增加一个新的依据。同时文学史书写中分期的基本模式初步奠定。

九 张衡《请禁绝图讖疏》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②安帝时征拜郎中，又迁为太史令，永和初为河间相，后拜尚书。张衡最为人所道者，乃其精于天文所造之浑天仪和地动仪，此

① 萧统：《文选卷一·两都赋》，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3页。

② 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第四十九》，中华书局，1965，第1897页。

外并精诗赋，不仅有《西京赋》《东京赋》等大赋作品，亦有《归田赋》《思玄赋》等抒情小赋，此外还有“铭、七言”等文学作品，对后世文学影响颇深。

讖纬之学在东汉时期风行于世，儒生争学图纬，更附以妖言。张衡拜议郎迁侍中后，慢慢接近权力中心，终于有机会对讖纬学展开清算。借用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张衡在写给汉顺帝的《请禁绝图讖疏》中，用客观的事实戳穿了图纬虚妄无稽的谬误：“图讖虚妄，非圣人之法”，建议“此皆欺世罔俗……宜收藏图讖，一禁绝之”。在回顾讖纬之学的历程时，张衡选取了“自汉取秦”“成哀之后”“哀平之际”等几个时间节点，运用庙号等分期方法对讖纬之学进行分期探讨。张衡相对于前面诸位，文学家的身份特征更为鲜明，这也印证了班固之后更多的文学家开始关注并践行书写，虽然书写的内容还是大文化的范畴，但更为纯粹的文学史书写伴随着文学界限的渐趋清晰也日渐增多。

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或观星辰逆顺，寒燠所由，或察龟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术也。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讖书。讖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讖。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讖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讖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讖》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论

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摘讖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讖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讖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而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讖，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①

十 王逸《楚辞章句序》

王逸（生卒年不详），字叔师，南郡宜城（今湖北襄阳宜城县）人。自幼“博雅多览”，安帝元初中为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其所作《楚辞章句》，是现存《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另有“赋、诔、书、论及杂文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②。

《楚辞》经西汉刘向辑为十六卷，王逸增入己作《九思》一卷，改编为十七卷。《楚辞章句》对《楚辞》各篇作了文字注解，同时记述了各篇的创作由来和作者经历。在总序中，就《离骚》诞生的社会学术背景以及如何评价屈原及其作品的问题，王逸选取了

① 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第四十九》，中华书局，1965，第1911~1912页。

②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列传第七十上》，中华书局，1965，第2618页。

“昔者孔子”“其后周世衰微，战国并争”“至于孝武帝”“孝章即位”等时间节点，先后说明孔子的学术成就、战国百家争鸣的氛围下屈原作《离骚》的社会学术背景、孝武帝命刘安作《离骚经章句》的大义以及孝章帝在位时班固、贾逵各作《离骚经章句》以弘道艺等问题，最终归结为自身稽旧章、合经传的整理，为所撰梳理了历史和学术的背景。

昔者孔子睿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

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懣，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

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纡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①

^① 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经第一·王逸序》，中华书局，1983，第47~48页。

十一 赵岐《孟子题辞》

赵岐（约110~201），字邠卿，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初名嘉，因生于御史台故字台卿，因避难自改名字。后征拜议郎、太仆。年少明经，颇有才艺，著有《孟子章句》《三辅决录》等。

《孟子题辞》是赵岐对孟子身世及著作的论述。在孟学的后续流传方面，作者选取了“亡秦”“汉兴”“孝文皇帝”三个时间节点，结合两汉其他学术史的书写经验来看，“秦汉”作为两个王朝名称，“孝文皇帝”作为谥号，都是经常出现的时间节点。就分期思想来说，可以看出趋同的书写思路。

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①

十二 郑玄《诗谱序》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先习今文，后为古文，“括囊大典，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共百万余言，世称“郑学”，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诗谱》是郑玄对于《诗经》的研究著作，有关史料记载分别说明《诗经》诸篇产生的地域、时期、社会背景等，并排比谱系，

^① 焦循：《孟子正义卷一·孟子题辞》，中华书局，1987，第16~17页。

显示《诗经》各部分与时代政治、风土人情的关系。《诗谱序》则回顾了周代以来的政绩与诸篇章的联系，结论为良好王政必然产生美颂的诗歌，反之只能产生讽刺之作。因为直接落脚于王政，所以其时间节点的选择完全紧扣政治分期。

第一个时期尚无诗歌记载，具体包括“上皇”“大庭”“轩辕”“高辛”等数位上古帝王在位期间，“有夏”虽有篇章，但没有留存下来的诗歌作品。诗歌作品涌现是在西周，这属于第二个时期。商朝诗歌中没有风雅作品，周朝则不然。本时期又具体细分为“公刘”“大王、王季”“文、武”“成王、周公”这四个时期，虽各有时代特点，但统治者分别从粮食、财物、居所等密切关系民生的角度入手施之以政，在衣食无忧、安居乐业的基础上又制礼作乐，于是风雅颂皆备。第三个时期，虽还属于周朝，但已是后期，“政教尤衰，周氏大坏”，懿王、夷王、厉王、幽王等时期产生大量“刺怨”之作。逮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晋文公之后，“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①，于是孔子不再“正经”，转而“变风”“变雅”，以期达到“后王之鉴”的目的。郑玄的时间观念非常清晰，在序言的最后他又交代，“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②，他尊重史书记录的时间年表，以王政更迭为节点和顺序，为《诗经》建立纲目，以利于读者“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③。

①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诗谱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8页。

②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诗谱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9页。

③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诗谱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9页。

十三 应劭《风俗通义序》

应劭，生卒年不详，字仲远，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人。其父名奉，恒帝时官至司隶校尉。“少笃学，博览多闻”^①，灵帝时举为孝廉，又任泰山郡太守，后依袁绍，卒于邺城。著有《汉仪》《中汉辑序》《风俗通》等。其子珣、璩皆以文才称名。

应劭的观点类似郑玄，都在谈王政和社会（学术、风俗）的关系。风俗受时代影响，故分期来叙述以表明撰述动机，从学术角度而言选取时间节点“昔仲尼没”“战国”“汉兴”等，具体到风俗则以“周、秦”和“嬴氏之亡”简单分期。

小 结

两汉经历经、史、文渐趋分离，故而史料示例的选择难以截然区分，尤其汉朝初年，只能尊重大学术思考的背景，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通过西汉四篇和东汉十三篇材料的分析可以发现，至晚到西汉刘歆，文学（学术）史分期的基本节点均已在书写中出现，且基本范式已经确立；班固兼具史家和文学家两种身份，兼有史书和文学作品两种书写载体，在当时的背景下，为以文学家身份进入文学史书写以及正统史家更多关注文学史书写，树立了榜样。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家的 分期实践及思考

相对于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史已经基本从学术史中分

①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八·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第三十八》，中华书局，1965，第1609页。

离出来，告别混杂状态，且书写者的身份虽然各异，但自身都从事文学创作且有所成就。所以这一时期的史料来源或依托于文学作品的序言，或是史书中关于文学家或《文学（苑）传》的论述。本节主要选择傅玄《七谟序》和《连珠序》，皇甫谧《三都赋序》，挚虞《文章流别论》，檀道鸾《续晋阳秋》，沈约《宋书·谢灵运传》，锺嵘《诗品序》，裴子野《雕虫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萧统《文选序》，魏收《魏书·文苑传序》等十一篇典型展现分期实践及思考的文学史书写材料，通过具体分析其分期方法，探究他们更为尊重文学自身发展特征的分期观念。

一 傅玄《七谟序》

傅玄（217~278），字休奕，北地郡泥阳县（今陕西耀县东南）人，晋初文学家。“少孤贫，博学善属文”，“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在魏朝任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被封鹑觚男。入晋历任御史中丞、太仆、司隶校尉，卒后谥曰刚，追封清泉侯。曾受命“撰集魏书”，并“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亦为文史兼擅。^①其能诗，善用比兴，以乐府诗见长，代表作品有《秦女休行》《秋胡行》《九曲歌》。曾参撰《魏书》，著有《傅子》数十万言，另有《傅玄集》15卷，已佚。明人张溥辑有《傅鹑觚集》一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

^① 房玄龄：《晋书卷四十七·列传第十七·傅玄传》，中华书局，1974，第1317~1323页。

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辩》，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侈而托讽咏，扬辉播烈，垂于后世者，凡十有余篇。自大魏英贤迭作，有陈王《七启》，王氏《七释》，杨氏《七训》，刘氏《七华》，从父侍中《七诒》，并陵前而邈后，扬清风于儒林，亦数篇焉。世之贤明，多称《七激》工，余以为未尽善也，《七辩》似也。非张氏至思，比之《七激》，未为劣也。《七释》金曰“妙哉”，吾无间矣。若《七依》之卓犖一致，《七辩》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精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①

七体始自西汉文学家枚乘所作之《七发》，假设吴客论说七件事情，用以启发楚国太子，从而形成一种固定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章体式，后代模仿者众多。傅玄亦是仿效之，虽正文残缺，但为之撰写的序言却回顾了自枚乘起的汉魏两代作家创作七体的情况，于回顾和品评优劣过程中表明其对于该文体特征之认识，也即非常清晰地描述了七体成为专门文体的过程。相比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篇中对七体的梳理，二人都对七体源起枚乘后人承袭之颇有共识，其不同在于傅玄虽在晋世早于刘勰，却举例甚众，并且明确了后汉和曹魏之分期，而刘勰也有示例分析，更有对自汉至晋十余家作品的共同旨趣阐释，却没有将汉魏作者分开论述，所以在对七体的历史进行书写的分期问题上，傅玄更具代表意义。

在傅玄笔下，后汉承袭枚乘创作七体的著名作家和作品首先有傅毅《七激》、刘广世《七兴》、崔骃《七依》、李尤《七款》、桓

①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四十六·七谟并序》，中华书局，1958，第1723页。

麟《七说》、崔琦《七蠲》、刘梁《七举》、桓彬《七设》等篇，此外马融和张衡作为“通儒大才”，所作之《七厉》和《七辩》，影响后世作品十余篇。曹魏时期，英贤辈至，佳作频出，傅玄举出曹植《七启》、王粲《七释》、杨氏《七训》、刘绍《七华》、傅巽《七海》等五位代表作家和其作品，称赞这一时期的作品“陵前而邈后，扬清风于儒林”。在序言的最后，傅玄对于上述这些代表作品，又选出《七激》《七辩》《七释》《七依》《七启》五篇品评优劣，这一方法和刘勰有些类似，不同的是，傅玄所举为具体作品的特征，刘勰则是从宏观的角度对汉晋作品进行共性归纳。根据今人郭建勋的统计，现今可见的保留在各种文献资料中的七体作品，两汉三国时期共有 20 篇（已佚作品难以考量），就傅玄所举 15 篇作品来看，数量也已算宏大了。

傅玄另有《连珠序》一篇。

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蔡邕似论，言质而辞碎，然其旨笃矣。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典。^①

傅玄对于连珠体的历史，明确的是其兴起时间，相当于史书记讫的“起”，后惜同刘勰《杂文》篇中对于始自扬雄的连珠体的叙述类似，只列作家作品论其特色，却无文体史的分期阐释。刘勰举

^①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四十六·连珠序》，中华书局，1958，第 1724 页。

例尚有后汉杜笃、贾逵、刘珍和魏潘勖以及晋陆机等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家，傅玄则主要列举后汉班固、贾逵和傅毅及蔡邕，兼及晋世张华。后面分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诸文体的文学史书写中的分期意识时会进一步谈道，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家在分期问题上的处理思路和方法，都尚处于摸索阶段，虽较前人有很大进步，开始以历史观念进行不同阶段的对比研究，但亦未定型。当然，定型与否不能作为衡量文学史书写的唯一标准，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一问题在前面已经交代清楚了，此处不再赘言。

二 皇甫谧《三都赋序》

皇甫谧（215~282），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郡朝那县（今甘肃省灵台县）人，后徙居新安（今河南新安县）。皇甫谧“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曾为著作郎，一手为史，一手为文，“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①此外他还编撰了《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先生集》等书。

皇甫谧应左思之邀，为其《三都赋》作序，同时为赋体溯源追本，阐发了自身对于赋这个文体的认识，也即书写了赋史。就辞赋的起源和发展史来说，皇甫谧依照传统见解，认为赋起源于《诗经》，是古诗之流。故其论赋源于周，迄于东汉，其间以“战国”“汉”为时间节点。战国作为赋体兴起的第一阶段，王道衰败，《风》《雅》之风遭到破坏，于是各种失志的贤人选择赋体表达内心的世界，其中首推荀子和屈原，“遗文炳然，辞义可观”，是辞赋之首。继之还有宋玉之徒，然“淫文放发，言过于实”，有悖于风雅传统。第二阶段是汉代，贾谊创作赋体坚持“节之以礼”，符合

^① 房玄龄：《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皇甫谧传》，中华书局，1974，第1409~1418页。

皇甫氏“纽之王教，本乎劝戒”的赋体要求，然之后众者创作，多有违典雅、用词夸张、内容空洞，其中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甘泉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马融《广成赋》、王延寿《灵光赋》等作品，虽然也以“宏侈之辞”起笔，但最终以“约简之制”收尾，可为诸多汉赋作品中的翘楚。所以皇甫谥论赋史，能高瞻远瞩，探源溯流，对西汉以来的著名的赋家及其代表作据其要点进行分析，从而使人们第一次对西晋以前的辞赋发展史有一个较为完整和全面的认识。

玄晏先生曰：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隐没，靡得而详焉。周监二代，文质之体，百世可知。故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古诗之流也。

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寝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自时厥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虽充车联驷，不足以载；广厦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扬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焕乎有文，蔚尔鳞集，皆近代辞赋

之伟也。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祖构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返，非一时也。

曩者汉室内溃，四海圯裂，孙刘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拨乱，拥据函夏。故作者先为吴蜀二客，盛称其本土险阻瑰琦，可以偏王，而却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丰丽，奄有诸华之意。言吴蜀以擒灭比亡国，而魏以交禅比唐虞，既已著逆顺，且以为鉴戒。盖蜀包梁岷之资，吴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区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计殖物之众寡，比风俗之清浊，课士人之优劣，亦不可同年而语矣。二国之士，各沐浴所闻，家自以为我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论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辞，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案记而验，岂诬也哉！^①

三 挚虞《文章流别论》

挚虞（？~311），字仲洽，“才学通博，著述不倦”，曾任秘书监等职，其“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②后人把《流别集》中所作各种体裁文章的评论集中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原文已佚，尚有若干片断散见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文章流别论》是关于各种文体的性质、源流的专论，论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铭等十一种，但也旁

① 萧统：《文选卷四十五·三都赋序》，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037~2040页。

② 房玄龄：《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挚虞传》，中华书局，1974，第1427页。

及文章的作用和对文章的评价。从现存的文献中，挚虞对颂、赋、诗、七、铭、哀辞等六种文体，从起源出发，述及流变，进而延伸至特征和功用价值，并适时举出代表作家作品以为例证，堪称综合文体的代表文学史论著。而其中，通过残文能够发现时间节点从而体现其分期意识的，则仅有赋和哀辞两篇。

对于赋体，挚虞的认识与皇甫谧非常类似，不仅都认为赋为“古诗之流也”，而且在文体史的分期处理上也有趋同选择。首先是荀子和屈原为代表的时期，“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颇有古诗之义”，故称“古诗之赋”。其以《楚辞》为代表，至承袭者宋玉已多“淫浮之病”了。其次是贾谊的作品，效仿屈原，值得称赞，而之后的作品则属于“今之赋”，“以事行为本，以义正为助”，重形式轻内容，存在“背大体而害政教”之“四过”。^① 因为难见原貌，所以在分期方法上，我们只能将其定性为简单分期，没有明显的时间节点，只选择代表作家代表某一个历史阶段。因此，虽然挚虞和皇甫谧在对汉以前赋体的发展史见识颇似，然而挚虞却不似皇甫点明“战国”“汉”两个时间节点般清晰明确。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

^①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七十七·文章流别论》，中华书局，1958，第1906页。

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①

哀辞这一文体的发展史，现存文献中仅存“建安”一个年号作为时间节点，故第一阶段以崔瑗、苏顺、马融为代表，其作品对象为夭折儿童或未能寿终之人；第二阶段为建安，徐干和刘楨奉命为曹丕和曹植各失稚子而作哀辞，未见为不能寿终者而哀之辞。虽然有时间分期，但前后都“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②为特征，仅在作品内容上面有所不同。

四 檀道鸾《续晋阳秋》

檀道鸾，生卒年不详，概为刘宋时人。所作《续晋阳秋》一书记述东晋一代史事，虽已亡佚，但从《世说新语·文学篇》中辑出的这一段文字，却是具有明确时间意识的文学史书写佳作。檀氏认为《诗》《骚》是我国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并以此为基点和原则，对两汉迄于东晋六百余年的文学发展情况分阶段进行回顾，对于后世实具发聩之功。

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

①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七十七·文章流别论》，中华书局，1958，第1905页。

② 李昉：《太平御览五百九十六·文部十二》，中华书局，1960，第2687页。

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①

对于有汉一朝，檀道鸾以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三位文人为代表，赞其体从诗骚传统，至建安时期，达到文质并重的“诗章大盛”之局面。而西晋潘岳、陆机等人虽时有质文，但已然缺少深刻的社会意义与积极的人生理想，比较单纯地追求华彩和绮丽，同汉以来的诗统已显差别。尤其是正始之后，玄言注入并渐趋统治诗坛。玄言风气始于魏正始之王弼与何晏，他们崇尚“《庄》、《老》玄胜之谈”，引发世人对于玄学的追慕，到东晋偏安江左之时，更是风靡一时，在作者眼中，尤以李充为最。郭璞在五言诗创作方面，将“道家之言”引入玄言诗的创作中，以《游仙诗》横亘诗坛。而许询和孙绰作为东晋玄学之中坚人物和玄言诗之代表作家，又吸收佛家妙义入诗，由曹魏西晋时期的庄、老、易“三玄”，演变为佛道融通的四玄之学，也就彻底地抛弃两汉以来的诗骚传统，导致“《诗》、《骚》之体尽矣”。直到东晋义熙年间，以谢混为代表的山水诗创作人群兴起，才促使玄言诗逐渐告别诗坛。整体而言，作者没有采取照搬朝代更迭或者年号变换的历史分期方法，而是从诗骚这两大文学传统出发，考察诗体的发展演变情况，体现了科学的分期意识。当然，作者依然需要借用朝代和年号作为时间单位——西朝、江左两个朝代“名称”和建安、正始、义熙三个年号，以起到对文学发展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断限作用。而这一方法，其他文学史家在分期实践中，也有所借鉴。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文学第四》，中华书局，1983，第310页。

五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

沈约(441~513),字休文,自幼“笃志好学,昼夜不倦”,“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且“能属文”,相比“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曾任著作郎等职,故其著作包括“《晋书》百一十卷,《宋书》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述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和《四声谱》,文史兼备。

历仕宋、齐、梁三朝的沈约在《宋书》的《谢灵运传》中所写的“史臣曰”部分^①,立足于南朝齐梁时期,以诗体发展为主线,将古代有虞氏时期作为文学史的书写起点,一直延续到其出生时的刘宋一朝,同样并非局限于朝代,而是通过运用虞夏、周、汉、魏、晋、宋六个朝代名称以及建安、元康、建武、义熙、太元五个年号,划分出八个历史阶段,分别论述了不同时期的文学史标志作家作品或文坛现象。因为檀道鸾著述早已亡佚,且《宋书》被后世奉为正史,所以这篇传论更堪称这一时期文学史书写的代表作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文学新变的观念一直存在争论。沈约从创作到理论都表现出对于文风变化的追求,在其对文学史的分期书写中,基本上每个时间断限都是由“变”开始的。周王朝末年之后,文坛创作风气以战国的屈原、宋玉和西汉的贾谊、司马相如为代表,是为一变:“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此后,对情与志的追求在创作中愈发占据主要位置,两汉时王褒、刘向、扬雄、班固、崔骃、蔡邕等人“清辞丽曲,时发乎篇”,但终因音

^① 沈约:《宋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二十七·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74,第1778~1779页。

调芜杂、声气沉赘而无绝世之音，惟张衡长于抒情，开启东汉文人诗以抒情为主的创作趋势，“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是为二变。建安时期，以曹氏父子为主，终于将“情”“文”“质”三者良好地结合在诗歌创作之中，“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可谓三变。西晋孝惠帝元康年间，潘岳和陆机以绮靡繁缛的文风驰骋文坛，一改建安之风，“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馥烈，事极江右”，是为四变。其后，“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大概在孝怀帝永嘉年间玄言始开入诗风气，一直沿袭到“自建武暨乎义熙”的东晋，玄言诗逐渐发展到顶峰阶段，“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遁丽之辞，无闻焉尔”，可谓五变。扭转这一局面的是殷仲文和谢混（叔源）二人，他们一改孙绰、许询推至极致的玄言之风，将山水题材逐步纳入诗歌创作之中，“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是为六变。其后，颜延之和谢灵运两位文学巨匠登上文坛，“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在文学史上承上启下，沾溉后世，可谓七变。由社会时代之变生发为文风之变，沈约的历史观念在上述的文学史书写中一览无余。^①

六 鍾嵘《诗品序》

鍾嵘（467?~519?），字仲伟，自幼“好学，有思理”，曾为“宁朔记室，专掌文翰”。和檀道鸾一样，在文学史书写中以《诗》

^① 沈约：《宋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二十七·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74，第1778页。

《骚》传统为基准。他的《诗品》堪称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详尽探讨文学源流的著述，其总论将五言诗的发展分为七个阶段，并作出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与檀道鸾所作《续晋阳秋》实为史书，不同的是，《诗品》的立足点仅仅在于诗体尤其是五言体诗，因而其书写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也更加了解文学本体，对于后世的文学史书写也就更有启发意义。

昔《南风》之词……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楨、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以含跨刘、郭，凌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①

① 鍾嶸：《诗品注·总论》，陈延杰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第1~2页。

从这段文字的表面上看，锺嵘针对五言诗的发展历程划分出七个阶段，所采用的分期方法仍为运用朝代和年号这些历史符号来代表历史阶段意义：从“夏”“楚”五言之滥觞，至“汉”“东京”之体制初见；从建安“彬彬之盛”，到“有晋”“太康”之“中兴”；从“永嘉”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至“江表”之“微波尚传”；从“义熙”之“谢益寿”，到“元嘉”之“谢灵运”，一直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更多的是借用年号来对五言诗的发展划定阶段。并且锺嵘以重要作家作为年号分期的辅助手段，最后分别举出建安、太康、元嘉这三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陈思王曹植、刘公干、王仲宣、陆机、潘安仁、张景阳、谢灵运、颜延年。他们堪称“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

而透过这些年号和朝代名称可以看出锺嵘是以《诗》《骚》传统为指导，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来进行文学史书写实践的。其认为两汉时期辞赋创作竞相出现，却始终没有出现兼具文质的优秀诗作，整体发展非常困顿。而曹氏父子统领的建安时期，良好的文学环境、卓绝的文学领袖、整齐的文人集团，形成了五言诗发展“彬彬之盛”的良好局面。而他们所代表的“建安风力”也就成为作者心目中的五言诗标准，具体而言就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经过建安二十余年的蓬勃发展，五言诗至曹魏时期走向了低谷，直至西晋太康年间迎来短暂的中兴。然西晋永嘉年间，五言诗这一诗歌样式虽然继续发展，但在诗歌表现主题和内容上，追崇黄老之学、慕尚虚谈之社会风气影响了诗人的创作，玄言风气逐渐发展直至涵盖整个东晋时期，以孙绰、许询、桓温、庾亮诸人为代表的江左玄言诗人群体，尽失建安风力的优良传统。虽然也出现逆玄言而动的两位诗人——郭璞和刘琨，前者以《游仙》闻名，后者因“悲壮”称世，二人虽名扬当时、名传千载，但终未能扭转当时玄言“平典”之体盛行的状况。直到义熙年间，谢混在变创体

例方面有所贡献，其后刘宋一朝谢灵运横空出世，创建山水诗这一中国诗歌之重要流派，宣告了玄言诗的结束，使五言诗创作渐归正途。

七 裴子野《雕虫论》

裴子野（469~530），字规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出身于世族大家，史学世家。裴子野从齐入梁，历任齐武陵王国左常侍、著作郎、中书侍郎、步兵校尉等职，但为人古朴质实，淡泊功名。其创作“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所著《雕虫论》明确反对“摈落六艺”、“非止乎礼义”的文风，对当时“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巧而不要，隐而不深”的颓废文风进行严厉的批评。

裴子野把“四始六艺”作为诗歌的根本，以《诗经》为典范，所以他的文学史分期始自《诗经》，以“古者”和“后之作者”分为两个阶段。裴子野认为《诗经》后的文坛，由于屈原《楚辞》系列开辟了重视辞藻的风气，而过分追求形式美必然干扰其劝美惩恶的社会功能，后续司马相如、蔡邕、扬雄等人皆“随声逐影”。其后对于五言诗，裴氏进行了相对细致的分期论述。首先所谓“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举出两位作家代表各自所处的时间阶段：汉、魏、西晋。虽然裴氏对于“后之作者，思存枝叶”不满，但他对曹植、刘桢、潘岳和陆机四位依然推崇，即便“潘、陆固其枝叶”，可知其对文采亦非截然反对，但必须无妨风力而已。然后，设置“江左”“宋初”“元嘉”“大明”四个时间节点，对东晋和刘宋两个朝代的文学史进行分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裴氏将刘宋时期的五言诗创作细分为两个阶段，“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和“大明之代，实好斯文”，这在同时期文学史家之中是鲜见的。

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悱惻芬芳，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扣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赋诗歌颂，百帙五车，蔡邕等之俳优，扬雄悔为童子，圣人不作，雅郑谁分？其五言为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揜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风也。若季子聆音，则非兴国；鲤也趋室，必有不取。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①

八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

萧子显（487~537），字景阳，齐高帝萧道成之孙，“幼聪慧”，“好学，工属文。尝著《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又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又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所著《后汉书》一百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在文史两个领域均有不俗的成就。^②

① 李昉：《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二·沈四》，中华书局，1966，第2873~2874页。

② 姚恩廉：《梁书卷三十五·列传第二十九·萧子恪传》，中华书局，1973，第511~512页。

如果说，沈约是在为大诗人谢灵运立传时顺便书写了文学史，并在其中婉转地表现了其文学新变主张的话，那么萧子显作为梁代著名史学家，则是在《南齐书》中专门设立了《文学传》，并在这篇传论中明确强调了文学需要不断发展的“新变”观：“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①而就在详细论证这一观念时，萧子显对昔日文学历史作出了明确回顾：

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②

对东汉建安至刘宋时期诗坛的大体发展情况，萧子显举出了十位文士作为不同时期的代表，以说明文风的变化情况。虽然对于建安文学的认识，萧氏明确提出邴下俊彦与曹氏父子差距明显，但其所点出的潘岳、陆机、许询、殷仲文、谢混、颜延之、谢灵运等人，都曾是沈约推举出的曾经引导文坛新变的重点作家，可见两位文学史家前后相继的历史传承关系。而且，不同于其他文学史书写实践，萧氏仅仅借用了两个具有时间断限意义的名称“建安”和“江左”来进行分期，其余则是利用代表作家来完成分期叙述。有学者曾发出“经典作品成为了文学史上的高潮和分期依据”^③的感叹，其实代表作家同样可以成为文学史的分期依据，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的文学史编撰就是明证。而代表作家的选取，则是根据史家心目中对于文学发展所认定的新变观念，可见萧子显的文

①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传》，中华书局，1972，第908页。

②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传》，中华书局，1972，第908页。

③ 张荣翼：《文学史中的三种价值评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4期，第122页。

学史分期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不在朝代而在文学自身的发展变迁。

九 萧统《文选序》

萧统（501~531），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梁武帝萧衍长子。天监元年（502）被立为太子，然未及即位便英年早逝，谥号“昭明”，故后世又称“昭明太子”。萧统编有或著有《文集》二十卷，典诰类的《正序》十卷，五言诗精华《英华集》二十卷，历代诗文而成的总集《文选》三十卷。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萧统笃信佛教，佛教著名的大乘经典《金刚经》，其中“三十二分则”的编辑，即为萧统。萧统主持编撰的《文选》，作为我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八九百年间，100多个作者，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分为三十七类。他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同学术著作、疏奏应用之文区别开来，反映了当时对文学的特征和范围的认识日趋明确。

萧统在《文选序》中主要说明其文学观念和选录标准，对于各个文体的历史回顾并非重点，故在分期问题上仅有简单的处理，并且和皇甫谧、挚虞、裴子野等人有着相当一致的分期观念。在赋体的简要介绍中，萧统首先标举“诗有六义”，为赋之源头，用“古昔”和“今”大体区分两个阶段，而“今”这一时期，是荀子和宋玉以及贾谊和司马相如前后相继兴盛了赋这一文体的发展。而对于诗体的概略论述中，则以“炎汉中叶”这一时间节点作为四言和五言两类诗歌样式的分水岭。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

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①

十 魏收《魏书·文苑传》

魏收（507~572），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西）人。北齐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与温子昇、邢邵并称“北地三才子”。北齐文宣帝在天保二年（551）诏令魏收撰修《魏书》，这是北齐政权设立史馆修撰的一部史书，不足四年便成书。全书共130卷，80余万字，有十二本纪14卷，列传96卷，十志20卷。主要记述北魏和东魏两个政权共160余年的历史。

南北朝文学史书写实践，同这一时期的社会和文学发展情况相类似，那就是北不及南：北朝由于先天不足，在文学方面明显落后于南朝。但是作为北朝史家的魏收在《魏书》中，不仅学习汉族史书体例设置了《文苑传》部分，而且在序言中进行了文学史书写的尝试。

^① 萧统：《文选·序》，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2页。

淳于出齐，有雕龙之目；灵均逐楚，著嘉祸之章。汉之西京，马扬为首称；东都之下，班张为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陆机则晋朝之秀，虽同时并列，分途争远。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章殄灭。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赵，网罗俊义。逮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蹕曹丕，气韵高艳，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肃宗历位，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①

魏收针对南北朝时期南北相对的政治局面，进行了地域的区分。先是论述了中原地区的文学发展的历史状况，从以齐楚为代表的战国时期到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四个朝代；文学发展分别举出淳于髡和屈原、司马相如和扬雄、班固和张衡、曹丕、陆机作为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家，并且以西晋永嘉（307~312）西晋孝怀皇帝司马炽时期为转捩点，指出其后“天下分崩”，战事纷仍，中原之文学发展受到沉重的打击。而此时的北方，作者以四位统治者圈定三个时期，借用其庙号分成三个阶段进行评述。首先，是北魏的初期，“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赵，网罗俊义”，扩大疆域，广揽人才。其次是北魏孝文帝统治时期，迁都洛阳，禁鲜卑语推广汉语，改鲜卑姓为汉姓，兴办学校，等等，这些政策措施都为推动北方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大力提倡文学创作，开创北方文学发展的新局面，故而作者对其不吝溢美之词，认为孝文帝足以同汉武帝和魏文帝相媲美。最后则为肃宗孝明帝元诩在位时期，作者认为在前面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北魏文学发展呈现“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的繁盛局面。这三个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层层递进的关系，从早期的网

^① 魏收：《魏书卷八十五·列传文苑第七十三》，中华书局，1974，第1869页。

罗天下贤才至中期的大力发展文学，直至文坛出现繁荣景象，可见魏收具备清晰的历史思维。

这则文学史书写分期实践，还透露出魏收对于文学发展动力论的观点，即统治者是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而在南北朝时期，持有这一观点的亦不只其一人。由陈人姚察及其后人共同完成的《梁书》亦设有《文学传》^①，作者在序言中充分表达了对于梁武帝萧衍大力推动文学发展的称颂。梁武帝“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注重“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每逢百官来临、兴致高雅之时，便命群臣共同吟诗作赋，对于出类拔萃之才俊，更是出手慷慨，奖励以重金，“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诸多光耀后世的文士俊杰，如沈约、江淹、任昉和王僧孺等人，从此出现“文章之盛，焕乎俱集”的盛大场面，而其原因，正在于“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从其分期意识来看，虽然其视角仅仅局限于有梁一朝，但其通过推举代表作家（前为沈约、江淹、任昉，后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来区分时间先后的方法，却和其他文学史家的书写实践前后相承。

小 结

通过列举檀道鸾、鍾嶸、沈约、萧子显、魏收等人文学史书写的代表性论述，可以发现，他们对文学史的认识具有很多的一致性。首先，文学史书写的介入时间节点虽然不同，但从汉代开始中国文学就已经开始稳步发展成为大家的共识，下限则是书写者所处的年代。其次，对于文学史的回顾与总结，虽然立足点稍有不同，有的因循《诗》《骚》传统，有的追求新变，但宏观把握没有太多

^① 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传》，中华书局，1973，第658页。

互相抵牾之处，尤其在时间节点的选择上，建安、义熙等年号以及许询、谢混、颜延之、谢灵运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时期文学发展的情况以及所开启的文学发展的新途，诸位文学史家对此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再次，不论是以史家身份出现的檀道鸾、沈约、萧子显、魏收，还是以文学家身份示人的锺嵘，由于他们自身对于文和史有充分储备积淀，所以在进行文学史写作中基本没有倾斜于某一方面，而是能够用客观的历史意识去审视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并且出现了前后互相借鉴吸收的良性继承。余嘉锡先生曾经指出，相比沈约和锺嵘的文学史书写，檀道鸾更具开创之功：“二家之言，并导源于檀氏……其间源流因革，檀氏此论实首发其蕴矣。”^①

由此，在文学史分期问题处理方法上也就具有共性。首先，不论是史书中的文学史书写，还是文学家对于文学发展作出的回顾，这些文学史家都遵循基本的时间发展顺序，但也并未局限于朝代文学，而是充分尊重文学的内部因素。其次，这些文学史家多善于运用年号，而文学史论述中的年号，则不仅代表统治者，也是为了更好地将文学自身的发展同政权的变迁连接起来，也表明了他们于史书撰写中所受到的影响或启发。而文学自身发展对于分期的影响，还存在代表作家的因素，某些时代已经被当时闻名文坛的作家光芒所笼罩，举出某位作家，似乎就已经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全部，无须再提及朝代甚或年号。总体来讲，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而又不拘于王朝的嬗替，大体按照西汉、东汉、曹魏、西晋、东晋、刘宋等这样的分期进行论述，又以文学自身的发展为重，可以跨越朝代，也能根据年号选择某一阶段。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文学第四》，中华书局，1983，第315页。

第四节 刘勰的分期实践及思考

一 《文心雕龙》的文学史意义

关于《文心雕龙》一书性质的认识，历来分为两大阵营：一方认为《文心雕龙》为文章学著作，另一方则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批评著作。

明代学者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三《文》说：“古今之论文者，有魏文帝《典论》，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柳子厚《与崔立之论文书》。近代则有徐昌穀《谈艺录》诸篇，作文之法，盖无不备矣。苟有志于文章者，能于此求之，欲使体备质文，辞兼丽泽，则去古人不远矣。”^① 顾起元《文心雕龙序》说：“彦和之为此书也……前乎此者，有魏文之《典》，陆机之《赋》，挚虞之《论》，并为艺苑悬衡。彦和囊括而殚究之，疏论词源，博裁意匠，甄叙风雅，扬榷古今，允哉！述作之金科，文章之玉尺也。”^② 二人均认可其“作文之法，盖无不备”“述作之金科，文章之玉尺”文章学著作的性质。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肯定《文心雕龙》的价值与地位，于清代始见端倪。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五·诗话》曰：“《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始祖也。”^③ 在西方批评学理论观念的影响下，20 世纪上半叶出现的

①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三《文》，转引自张少康《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81页。

② 顾起元：《文心雕龙序》，转引自张少康《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81页。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五·诗话》，中华书局，1985，第559页。

几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集中表明《文心雕龙》文论史地位的确立。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十二章《刘勰》认为：“吾国文学批评，以齐梁之间为最盛。刘勰之《文心雕龙》，锺嵘之《诗品》，皆成于此期中，并为文学批评之杰作。”^① 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汉魏南北朝部分）第八章《论文专家之文学》中，专列《刘勰以前之一般的文学批评家》一节予以论述，认为“纯粹的文学批评的专篇论文始于魏而盛于晋，文学批评的专书始于晋而盛于梁”，其中“成功的、伟大的批评专家只有刘勰与锺嵘”。^②

现当代以来的认识，基本延续这两大阵营：文章学著作和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或者折中为杂文学理论著作的。前者以王运熙、李庆甲、罗宗强等为代表，后者以王元化、杨明照、牟世金、张少康等为代表，介于两派之间的则以蔡钟翔为代表。在这几大派别之中，学者们或也看到了《文心雕龙》所蕴含的文学史思想，但因为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体例等问题的差异，尚几无人将其看作文学史著述。这种观念也有其背景。不只对于《文心雕龙》，大多学者都认为自西方现代学科体系之文学史传入中国以前，中国是没有文学史的。陈介白在为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写的《序》中就曾说过：“惟有说明历代文学的变迁，使人得到历代文学变迁的清楚概念，方可值得称为文学史”，“只罗列经史子集不能算作文学史，只备载文学家的传记不能算作文学史，只以爱情为去取而选录文学作品，也不能算作文学史”，“中国以前没有文学史专书，虽说《文苑传》有些近似文学史，其实《文苑传》不过简略记文人的姓名履历而已，于文学的变迁得失盖皆缺略，故不能当作文学史

①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46~47页。

②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09~212页。

看。”^① 虽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方式应有多种可能性，不能因为历史发展结果（当然，历史发展永远没有尽头）即现在的颇为趋同化的写法而忽视历史发展起源和过程中丰富多彩的多元化取向，抹杀文学史书写的各种可能性和多元化空间”。^②

不管学者们对于《文心雕龙》的认识偏重于文章学还是文学理论，不可忽视的是其“史、论、评”三者相结合的特色。正如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所说：“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显然，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都不能‘凭空’产生。可是反过来说，没有一套课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③ 对于这一点，学者们也深表认同。王元化于《一九八七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这篇文章中说：“《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者，它在内容上将史、论、评兼综在一起，读了这部书可以了解我国从先秦到南朝齐代的文学发展史，文学理论的原则与脉络，文学体裁的分类与流变，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的标准与风范。总之，它可以说是当时一部文学百科全书。”^④ 牟世金在《文心雕龙研究》一书中也指出：“《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的史论评相结合的著作。”^⑤ 而就笔者看来，研究多重其论和评的

① 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陈介白所作序言，东方出版社，1996，第1页。

② 罗云锋：《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建构——从清末至抗战前的一个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③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32页。

④ 王元化：《一九八七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转引自张少康《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381页。

⑤ 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转引自张少康主编《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390页。

部分，对于“史”的部分略显忽略。

明确提出《文心雕龙》是文学史著述的观点十分少见。方铭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春之卷的一篇名为《文学史与文学历史的复原——关于文学史写作原则及评价体系的思考》的文章，其中说道：“如果我们用这种与西方历史主义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一致的尺度来衡量古代文学史著作，古代学者的成功范例也可以说比比皆是，一部《文心雕龙》，不但《时序》是文学史，其他各篇，与其说是文学理论著作，倒不如说是刘勰之前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其文体论和创作论，其中复原历史的痕迹，是不难寻绎的。”方铭认为：文学史研究属于历史研究范畴，是对文学历史的研究。其目的，“首要是复原文学的历史，这个复原，包括对文学观念的复原和文学活动的复原”，即“按照一定时代的文学观念，来努力勾勒出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全貌”，其次才是“评价这种历史面貌和历史变迁”。“而这两个目的，复原的任务远比评价的任务重要”。按照这种逻辑，作者认为“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就不是从近代开始，在中国古代历史著作体系中，特别是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正史系统，其《艺文志》、《经籍志》，以及《儒林传》、《文苑传》，还有大量的列传，如《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汉书·扬雄传》，无不是有关文学史的著作”。因为它们无一不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文学家进行了综合评价”，并且又是以“实录精神来写作的”，“功绩首先在复原历史”。^①罗宗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提到《文心雕龙》的前半部分，主要指文体论部分，“就是一部文学史，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部文学史看。首论文之起源，辨源流，谓

^① 方铭：《文学史与文学历史的复原——关于文学史写作原则及评价体系的思考》，《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春之卷，第20~23页。

文渊源于六经。继论各体文章之产生、流变，描述出各体文章的发展风貌，作出评价。既可以看出史的脉络，又可以看出他对待历史的价值判断准则。在他对各体文章作历史的考察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有着完整的文学史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带着我国史学传统的浓厚色彩，可以看到史学而文学的明显轨迹”。^①

其他文章，则至多是谈到刘勰的文学史思想。比如温潘亚之《论刘勰的文学史思想》指出，刘勰的《文心雕龙》虽不是一部文学史巨著，但其中却蕴含着丰富的文学史思想。它包括以“文原于道”为核心的文学起源论；以“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等为核心的文学发展论；以从史学到文学、从“博观”到“见异”和“唯务折衷”等构成的文学史方法论；以“六义”作为文学史评价标准等四个方面。^②这一系列系统而独到的观点对 21 世纪的文学史学学科建设仍具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此外，朱自清在对待文学史的问题上，既看到了西方现代观念对我们创建自己文学史的影响，认为“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我们有了文学史，并且将小说、词曲都放进文学史里，也就是放进‘文’或‘文学’里；而曲的主要部分，剧曲，也作为戏剧讨论，差不多得到与诗文平等的地位。我们有了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这是我们的第一部文学专史或类别的文学史”^③，又十分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因素，指出“清末我们开始有了中国文学史。‘文学史’虽也是输入的意念，但在我们的传统中却早就有了根苗。六朝时沈

①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第290~291页。

② 温潘亚：《论刘勰的文学史思想》，见葛红兵、温潘亚《文学史形态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第70~84页。

③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第1页。

约、刘勰都论到‘变’，指的正是文学的史的发展”^①。

学者们涉及《文心雕龙》的文学史思想，多谈《时序》篇，认为该篇作为探讨时代与文学关系的专论，“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是典型的文学史论述。夏传才先生曾言：“《时序》一文，按照时代顺序评述各个时代文学发展演变的情况，说明时代演变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一篇评述作者以前的文学发展过程，探讨文学发展规律的专论，集中地体现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②《文心雕龙研究史》在评价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一书中，明确指出在周氏笔下，“《时序》是讲历代文学的演变的，是文学史”^③。王运熙在《刘勰的文学历史发展史观》一文中也指出：“刘勰的文学历史发展观，主要表现于《文心雕龙》的《时序》、《通变》两篇。《时序》一篇，结合中国古代历朝时世的推移来阐述文学的发展变化，内容丰富深入，其中涉及若干文学史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通变》探讨文学创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中间也谈到历代文学发展变化的趋势，可与《时序》互相参照。”^④ 其和杨明共同编著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又谈道：“《时序》、《才略》两篇，更是概括评述了历代文学的发展和著名作家，是简要的文学史和作家论。”^⑤ 胡大雷则指出：“《才略》篇俨然一部以作家为排列的文学史。”^⑥ 由此可见，学者们多看到了《时序》篇的文学史意义，或者还包括《通变》和《才略》两篇。其实《文心雕龙》全篇很多地方都包含着文学史论述意义的因子，连缀成篇，《文心雕龙》的文学史意义

①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544页。

② 夏传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篇今译》第一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第224页。

③ 张少康：《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341页。

④ 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52页。

⑤ 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378页。

⑥ 胡大雷：《文心雕龙的批评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9页。

特质非常明显。

1904年，出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国文教习的林传甲，编写了七万字左右的《中国文学史》讲义，这可看作现代学科体系中中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对于“中国文学史”有着如此奠基意义的著作中，便专设有《刘勰〈文心雕龙〉创论文之体》一节，可见《文心雕龙》于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意义。其中，作者是这样认识《文心雕龙》的：“建安之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于焉。《典论》，其首也。其勒成一书，传习至今者，断自《文心雕龙》始。……《原道》一下二十五篇，皆论文章之体制；《神思》一下二十四篇，则论文章之工拙。”首先，作者强调的是，相比曹丕、陆机的文论“并属短篇”，“挚、李之书，均归散佚”，《文心雕龙》是作为第一部专著面世的。其次，强调《文心雕龙》的“论文之说”意义，依作者之意，即“论文章之体制”和“论文章之工拙”^①。在笔者看来，论文如果理解为论说文章发展演变情况，便可看作文学史的一种表现。同理，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以论汉魏晋六朝文学的变迁为重点，其中大量征引有关史实和评论资料，《文心雕龙》正是其一。换句话说，《文心雕龙》保存了大量的汉魏晋六朝文学的发展变迁史料，记录了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历程，是为具有文学史性质。

刘勰能够对文学发展的历史作出详细而多元的分析论述，同刘勰之前的文学史家所做的点点滴滴有益的探索实践是分不开的，同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也是紧密相关的。在论及魏晋南北朝众多文学史家的文学史著述时，笔者曾经多次指出其与史学的渊源，刘勰的著述也不例外。文史是刘勰文学史学得以建立的两大基础：文学的发展使得刘勰从历史发展角度总结文学发展

^①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132页。

情况具备了丰富的材料基础，史学的发展则给刘勰提供了方法和观念的指导。

从文学角度而言，魏晋南北朝是文学发生巨变的重要时期，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使得文学的世界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这就为文学史的编写提供了基本的材料。并且，编纂文集和收藏书籍之风开始盛行，史书中也越来越多地录入文学作品，使得后代的学者能够更便利地掌握前代作家作品的真实情况。由此，文学作品在保存和传播上已经跨越了历史时空，学者占有一手资料的机会愈加容易和增多，加之其自身的修养不断提高，注重文史两方面素质的培养，对文学史从宏观角度的把握也就越有可能和更具深度。

同时，史籍的书写目的与史学的社会功用思想，也深深地影响到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中所表现出来的撰述动机和目的，同史家对于史籍的希望要求十分相似。根据《文心雕龙·序志》篇，刘勰“搦笔和墨，乃始论文”的写作动机，首先是有感于宋齐以还文坛“言贵浮诡”“离本弥甚”的创作弊端，其次是因为“近代之论文者多矣”，但均“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①，可见刘勰著述动机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从通过著述所希望达到的目的而言，刘勰在《序志》篇中指出，“唯文章之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②，同于其对于史籍的要求：“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③他又提出文辞的标准在于“贵乎体要”，并且“恶乎异端”，亦同于史书的“彰善瘅恶，树之风声”之思想。《文心雕龙·史传》篇还提出了修史所应有的宗旨和态度，反观刘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序志第五十》，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726页。

② 刘勰：《文心雕龙注·序志第五十》，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726页。

③ 刘勰：《文心雕龙注·史传第十六》，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286页。

勰修撰《文心雕龙》的态度——撰写文学史的态度和修史的态度，又具有一致性。《序志》篇有言，“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①，表明代代相承的思想和承上启下的历史观照意识。由此可知，刘勰的文学史书写不仅意味着其对于文学的发展情况作出多方面的系统总结，还表现为借鉴历史的思想来关照文学，也就印证了文学史和历史之间的相互关联。下面就从分期问题着眼，试图解析刘勰在书写文学史过程中的时间观念，通过考察其所采用的分期节点和自汉代以来的文学史家的同异，完善对于先唐时期文学史家对于文学史书写中分期问题的实践与思想认识。

二 《时序》

《时序》包含唐、虞、夏、商、周、汉、魏、晋、宋、齐等十代之“辞采九变”现象，是《文心雕龙》公认的文学史论部分。刘勰认为文学发展蔚映十代，是对质文关系而言，具体到分期情况可以合并为七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春秋以前的时期，包括“陶唐”“有虞”“大禹”“姬文”“太王”“幽厉”“平王”七个阶段，这些时期流传的所谓早期的歌谣作品，其中文采情理已然可以看出跟随时世推移的机理。

第二个时期是春秋以后七雄逐鹿的时期，虽然百家争鸣，但唯有齐楚两国在文学方面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尤其屈原和宋玉的创作文辞艳丽，远超前世。

“有汉”一朝，可以分为前后汉两个时期，即刘勰分期中的第三、四个时期。前汉根据统治者的谥号可以细分为“高祖”“孝惠、文景”“孝武”“昭、宣”“元、成”“哀（平）”六个阶段：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序志第五十》，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726页。

高祖时大业初定，崇武轻文，《大风歌》《鸿鹄歌》为杰作；孝惠帝到文景帝时，经学开始兴起，贾谊、邹阳、枚乘等文人多有志向难申之憾；武帝推重儒家，以文宏业，不仅在柏梁台燕饮联句，还对枚乘、主父偃、公孙弘、倪宽、朱买臣、司马相如等人礼尚尊之，司马迁、吾丘寿王、严安、终军、枚皋等人亦因文采闻名于世；昭宣二帝承袭武帝文策，召集群儒于石渠阁谈经会文，王褒因此得以提拔；元帝到成帝期间，打开金马门搜集人才，扬雄虽然提倡经学却也崇尚赋作，刘向受命整理宫廷藏书，可为代表；哀（平）帝已为西汉末流，但重辞赋创作之风自武帝至今的百余年间虽有变化，但承袭《楚辞》的传统依然未变。

后汉同样根据统治者的谥号具体分为“光武”“明章”“安和”“顺桓”“灵帝”五个阶段。光武帝重视讖纬学说，文辞稍轻，然杜笃、班彪等人也因文辞而获得机缘；明帝章帝推崇经学，璧堂习礼，白虎观讲经，班固、贾逵执笔史文，东平王刘苍、沛献王刘辅亦善文论；和帝安帝至顺帝桓帝期间，出现班固、傅毅、崔骃、崔瑗、崔寔、王延寿、马融、张衡、蔡邕等大量作家，鉴于经学推广的力度和深度，其作品从思想到内容所受儒家经典的影响相较于前汉都有所增加；灵帝爱好辞赋，开鸿都之门广揽辞赋文士，然国之颓势已然影响文之运势。

第五个时期始自“建安”，贯穿曹魏统治几十年，根据谥号和年号分为“魏武、文王、陈思”“明帝”“正始”“高贵”四个阶段。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邺下文人，会集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玚、阮瑀、路粹、繁钦、邯郸淳、杨修等诸多俊才文士，形成彬彬之盛的文人集团，志深笔长，雅好慷慨，堪称史上绝响；明帝曹睿亦有文采，并设立崇文馆招揽何晏、刘劭等文士；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嵇康、阮籍、应璩、缪袭等活跃于文坛之上；高贵乡公曹髦虽然承袭英雅，也仅限于言论文章自相宜，文坛风貌已

然谈不上。

有晋虽然也可以分为西晋和东晋两个时期，但刘勰对于两晋文学有一个统一的总结，所以整体算作第六个时期。西晋可以分为“宣、景帝”“武帝”“怀愍”三个阶段，国祚短暂，对于文辞亦不甚重视，但却涌现出张华、左思、潘岳、夏侯湛、陆机、陆云以及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亢、孙楚、挚虞、成公绥等诸多文采卓著之士。东晋则可以分为“元皇”“明帝”“简文”三个文学发展阶段：元帝司马睿崇文倡学，刘琨、刁协、郭璞等文人受到重视；明帝司马绍颇似汉武帝，自身慧文，讲经赋文，庾亮、温峤等深受厚待；简文帝虽尚谈玄，却文采丰富，亦兴文囿。其余的晋成帝、康帝、穆帝和哀帝以及安帝和恭帝，在位时间短，无力谈及文学。虽然不同君主在位期间具有不同的文学风貌，但整体而言自从西晋谈玄之风盛行以来，直到东晋已经形成普遍的社会风尚，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替于时序”，这也是刘勰非常鲜明的发展观念。此外，刘勰在这里特别点出兼善文史的几位士人：袁宏、殷仲文、孙盛、干宝等，在前面关于文学史家的部分我们都有所论及，可见刘勰作为一个出色的文学史家，对其他文学史家的认同和赞赏。

刘宋是第七个时期，因与刘勰所处年代非常接近，所以虽然点评了武帝、文帝和孝武帝三位君主和文学的关联，但涉及分期问题仅仅言以明帝为界，其后的文理学问都开始衰落了。这也确为文学史转关之重要时期。所举出的四任统治者，宋武帝刘裕、文帝刘义隆、孝武帝刘骏、明帝刘彧，在作者笔下，均有推动文学发展的一己魅力：“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①至于代表文人则列举了王僧达、袁淑两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时序第四十五》，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675页。

家宗族和颜延之、谢灵运两大家族以及何逊、范云、张邵、沈约等人。

修史之人历来难修本朝史。南齐二十三年的短暂国运，刘勰举出四位统治者，分别为太祖萧道成、世祖萧赜、文帝萧长懋、高宗萧鸾，这里没有再进一步讨论不同统治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况，而是重在表现“运集休明”的萧齐一世，统治者皆为“文明自天，缉熙景祚”之人，或“圣武膺箴”，或“睿文纂业”，或“贰离含章”，或“上哲兴运”，在他们的领导下，“圣历方兴，文思光被”，“经典礼章，跨周轹汉”，文学发展呈现欣欣向荣之势。^① 文坛盛况远超前代，美赞之态鲜明，具体论述谦逊留给后人，亦无具体分期。

综上，《时序》篇虽位列文体诸篇之后，但通过所选取的时间节点——十个朝代，五十余个帝王的谥号（庙号）或者年号，基本囊括前面为文体撰史的所有时间节点，这就是刘勰的集大成之处。同时《时序》篇中“十代九变”的分期方法，在《通变》篇中有所呼应：“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缦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推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② 从以上考察中可发现，刘勰对于文学史的分期问题的处理方法与同期的文学史家相互呼应，基本囊括了其他文学史家所有的分期方法：从文学本体出发，以朝代更迭为依托，借用统治者的称谓和年号以及代表作家作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时序第四十五》，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675页。

② 刘勰：《文心雕龙注·通变第二十九》，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519~520页。

品来作为时间的定位手段，可谓集大成者。然刘勰也有与众不同的方面，即更为重视统治者的定位作用，在《时序》篇中竟然举出了五十余位统治者，其原因或和其心中文学发展的君主动力论关系紧密。

三 文体论

《文心雕龙》文体史论，共二十篇，涉及三十三种主要文体，细分则八十一一种^①。文体是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论及文体的变迁是刘勰文学史家的重要成就之一。刘勰的文学史，“是从他的文体论中得出来的”^②。那么文体论部分的分期情况如何呢？

所谓分期，必要条件是设定某一时间节点，并且阐释其前后的迁变。而时间节点的选择，因为尚处于文学史书写的初期阶段，并未形成固定模式。何谓固定模式？对于熟悉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的人来说，毋庸置疑，那就是所谓朝代分期法。朝代更迭是政治或者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期依据一般无异议，但作为文学史的分期方法，却饱受诟病，可终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主流分期方法。反观中国传统文学史书写，文学史家在选择时间节点的表达上，可以是朝代、统治者或者年号，也可以通过作家作品引领一个时期。因为一个节点必须对应两个阶段，而历史需要连贯的发展，所以能够设定一两个时间节点作为某一文体或者文学现象的分期就具有书写的鲜明价值和历史意义，即便每个阶段的书写方式未能达到统一，也已经具备时代特色的研讨意味。在上述思想指导下，根据分期观念和操作的清晰程度，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通过准确的时间节点（朝代/统治者/年号）引领文学发

①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第265页。

②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第49页。

展的历史阶段，文学发展的基本情况紧随其后，或者提纲挈领以作宏观概括，或者通过介绍代表作家或作品以为例证，总体非常清晰地叙述某种文体根据历史演进顺序的发展沿革。

将大体涉及十种文体的这一方法列为第一类，其考量在于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分期方法，跨越一千多年的时间回视，而且，当时可以这样成熟地操作，应该是振聋发聩的。而当时及前代之人如前所述，虽偶有为之，但在系统和规模上皆不及刘勰，所以说，刘勰开启了后世文学史书写在时间思路上的基本模式。

第二，不完全借助准确的时间节点（朝代/统治者/年号），而是通过举出某一或者某些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用以代表所在时期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的某种文体或者文学现象的基本风貌，总体上也是思路清晰地叙述了文学根据历史演进顺序的发展沿革。

第三，简单叙述某种文体根据历史演进顺序的发展沿革。对于某一文体而言，其发展历史并不能通过明确的时间节点来划分，不管是所谓的时间段限（朝代/统治者/年号），还是某些作家或者作品，在文学史家看来，并不具备历史连贯性，某一时期的文学风貌和上下时期的关联并不鲜明，故而难以划分前后相继的段限，只能采取有典型意义就落笔的方式进行书写，但又限于一个时期，或者两个时期，或者有时间跨度的不同时期。这类文体也具有趋同性，和文体自身演变有关，亦和作者认识有关。

（一）非常清晰、鲜明的分期实践

在这类分期实践中，每个阶段基本都有宏观介绍，并且多数附有代表作家或者作品的文体，包括诗、乐府、祝、箴、封禅、章表、奏、启、议、书记等。

1. 诗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乐

辞云：《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绮，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

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怛怛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

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俚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①

《明诗》作为文体论的开篇，以诗体为中心，是文体史书写中最重要的实践，涉及分期问题，思路也是非常的清晰。首先以汉为节点，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期举出“葛天氏”“黄帝”“尧”“舜”“大禹”“太康”等六个统治者的事例，以证诗“顺美匡恶”的功能由来已久，然后到了“商”“周”时期，风雅颂赋比兴所谓诗之六义皆以确立，延续到“春秋”时期，以诗言志以及彰显才华等价值都能体现在朝堂之上，亦可表达讽怨之情如“楚国”之《离骚》，即便“秦皇”焚书也依然会令博士作诗，可见诗之地位稳固。这都属于诗歌的早期，而到了汉朝之后，尤其是文人诗歌博兴，下面这一阶段的分期才愈加壮观。

刘勰以“汉初”“建安之初”“正始”“晋世”“宋初”五个时间节点引出五个阶段，并且辅以年号和谥号：汉朝是以“汉初”和孝武、成帝两位统治者的谥号细分时期；曹魏分为建安和正始两个阶段；两晋以“江左”为界，分别论述各个时期的诗坛风貌。具体到汉朝的诗歌发展，作者首先论述的是四言诗的发展史。在刘勰心中，四言是以“雅润为本”的“正体”，从“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到东汉“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一首一尾，大跨度地追叙了四言诗在汉魏晋时期的发展情况，其间提到汉武帝“柏梁列韵”和汉成帝“品录三百余篇”对四言诗发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明诗第六》，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65~67页。

展所起到的推动意义。虽然刘勰认为“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但却没有对四言诗着以更多笔墨，相反对五言诗的历史发展则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这一阶段的分期也主要是针对五言诗的发展而言的。

刘勰从五言诗久远的历史说起，“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是为五言诗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举出“两汉”五言诗之佳丽者，“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怛怛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建安”是“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在曹丕、曹植兄弟的率领下，王粲、徐干、应瑒、刘桢等人形成邺下文人集团，各具风采又有趋同的创作倾向，盛况非同一般，是为第三阶段。第四个阶段是正始时期，清谈之风兴盛，推崇老庄思想，以何晏等人为代表，卓尔不群的是阮籍和嵇康，此外还有应璩的《百一》堪为质朴直正之作。西晋是五言诗发展的第五个阶段，刘勰举出三张二潘二陆一左，概括这一时期的整体风貌是“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第六阶段为东晋“江左”时期，五言诗创作陷于玄谈，袁宏和孙绰是为代表，还有郭璞《游仙诗》堪为挺拔之作。最后一个阶段是（刘）“宋初”年，山水诗代替玄言诗勃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史家书史，一般不谈当代和近代，刘勰在其他文体的叙史中也很少提到刘宋时期近况，而五言诗则不然，可见其对五言诗的重视和了解，也见得五言诗的发展之蓬勃盛况了。

2. 乐府

夫乐本心术，故响浹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

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自雅声浸微，溺音腾沸，秦燔《乐经》，汉初绍复，制氏纪其铿锵，叔孙定其容典；于是《武德》兴乎高祖，《四时》广于孝文，虽摹《韶》、《夏》，而颇袭秦旧，中和之响，闾其不还。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河间荐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讥于《天马》也。至宣帝雅颂，诗效《鹿鸣》，迹及元成，稍广淫乐，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暨后郊庙，惟杂雅章，辞虽典文，而律非夔旷。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定雅歌，以咏祖宗；张华新篇，亦充庭万。然杜夔调律，音奏舒雅；荀勖改悬，声节哀急；故阮咸讥其离声，后人验其铜尺。和乐精妙，固表里而相资矣。^①

《乐府》篇中出现的具有时间节点意义的字眼有“秦”“汉”“魏”“晋”四个朝代名称，大体分为四个时期进行回顾。第一是秦前时期，举出了葛天氏《八阙》、黄帝的《咸池》、帝喾的《五英》、涂山氏的《候人歌》、有娥氏的《燕燕歌》、夏王孔甲的《破斧歌》和殷王怀念旧居歌，这些配乐之歌根据性情而作，“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深入影响人之心灵境界，又可“覩风于盛衰”，“鉴微于兴废”。春秋时期亦推重雅声，而后则“雅声浸微，溺音腾沸”了，引发作者强烈的不满。第二个阶段是两汉时期，经过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乐府第七》，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101~102页。

“秦燔《乐经》”，乐府于汉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刘勰将其细分为“汉初”、“武帝”、“宣帝”、“元成”和“后汉”五个小时期，举出代表作家作品和机构制度，也指出了乐府渐远雅声的趋势。第三个阶段是曹魏时期，“魏之三祖”“音靡节平”，“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亦同周朝正声雅乐相违背。第四个阶段为晋世，“傅玄晓音，创定雅歌，以咏祖宗；张华新篇，亦充庭万”，似有好转，然经魏杜夔和晋荀勖对音律和乐器的调整，乐律同古代相比也是已经发生改变了。

3. 祝

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无作，草木归其泽。则上皇祝文，爰在兹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至于商履，圣敬日跻，玄牡告天，以万方罪己，即郊禋之词也。素车祷旱，以六事责躬，则雩禜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辞，是以庶物咸生，陈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夙兴夜处，言于祔庙之祝。多福无疆，布于少牢之饌。宜社类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虔于神祇，严恭于宗庙也。

春秋已下，黜祀谄祭，祝币史辞，靡神不至。至于张老成室，致善于歌哭之祷；蒯瞶临战，获佑于筋骨之请；虽造次颠沛，必于祝矣。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丽也。汉之群祀，肃其旨礼，既总硕儒之仪，亦参方士之术。所以秘祝移过，异于成汤之心；侏子驱疫，同乎越巫之祝；礼失之渐也。

至如黄帝有祝邪之文，东方朔有骂鬼之书，于是后之谴咒，务于善骂。唯陈思《诒答》，裁以正义矣。

若乃礼之祭祀，事止告飧；而中代祭文，兼赞言行，祭而兼赞，盖引神而作也。又汉代山陵，哀策流文，周丧盛姬，内史执策。然则策本书赠，因哀而为文也。是以义同于誄，而文实告神，誄首而哀末，颂体而祝仪。太祝所作之赞，因周之祝文也。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班固之祀濛山，祈祷之诚敬也，潘岳之祭庾妇，奠祭之恭哀也，举汇而求，昭然可鉴矣。^①

祝文历史悠久，通过“周”、“春秋”和“汉”三个时间节点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迁变，体现了良好的文学史分期意识。首先是上古时期，包括三皇时期以神农氏十二月合祭谷物神、农神、邮亭神、猫神、虎神、堤神、水沟神和昆虫神等八神的祝文为代表，五帝时期以舜帝祭田为民求丰收的祝文为代表；三王时期则以商汤以黑牛祭天和求雨祭的祝文为代表，其特征皆是由统治者亲自向神祷告。第二阶段是周朝时期，出现主管向众神祷告的官员——太祝，规范了六种基本的祝文形式。这两个时期，祝文的基本内容均离不开祈福消灾。而自春秋以来，出现了混乱的局面，“黷祀谄祭，祝币史辞，靡神不至”，是为第三阶段。到了汉代以后，虽然礼仪众多，但一改最初祭祀者把造成灾难的罪责归于自身的态势，反推到平民身上，故而“礼失之渐也”。

4. 箴

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体义备焉。迨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祝盟第十》，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176~177页。

在勤。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①

这一段就具有非常清晰的分期理念，点明“三代”、“春秋”和“战代（国）”三个清楚且连续的时间阶段，后面分别交代各个时期箴这种文体的发展情况。夏商周三代，箴体兴盛。通过《逸周书·文传解》和《吕氏春秋·应同》可见《夏箴》和《商箴》的残句，周朝太史辛甲命百官所作《百官箴》已佚，作为掌管山泽苑囿的官吏虞所作之《虞箴》篇仍可通过《左传·襄公四年》见到，体制和用意都非常完备。春秋时期，箴文虽有衰势，但晋大夫魏绛引用《虞箴》中后羿爱好打猎不顾国事的例子讽谏晋悼公，楚庄王用箴文告诫国民“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道理，尚能体现这一文体的价值。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功名代替道德成为各界主要追求，文体与之相适应，虽然铭和箴都有警戒之功，但“铭兼褒赞”，相比“全御过”的箴文，更适应诸侯争霸的氛围，故而箴文绝迹。

5. 封禅

昔黄帝神灵，克膺鸿瑞，勒功乔岳，铸鼎荆山。大舜巡岳，显乎《虞典》。成康封禅，闻之《乐纬》。及齐桓之霸，爰窥王迹，夷吾谪陈，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缕，专在帝皇也。然则西鹑东鹄，南茅北泰，空谈非征，勋德而已。是史迁八书，明述封禅者，固禋祀之殊礼，名号之秘祝，祀天之壮观矣。

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铺观两汉隆盛，孝武禅号于肃然，光武巡封于梁父，诵德铭勋，乃鸿笔耳。观相如封禅，蔚为唱首。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铭箴第十一》，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194页。

尔其表权舆，序皇王，炳元符，镜鸿业，驱前古于当今之下，腾休明于列圣之上，歌之以禎瑞，赞之以介邱，绝笔兹文，固维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则文自张纯。首胤典谟，末同祝辞，引钩讖，叙离乱，计武功，述文德，事核理举，华不足而实有馀矣。凡此二家，并岱宗实迹也。

及扬雄《剧秦》，班固《典引》，事非镌石，而体因纪禅。观《剧秦》为文，影写长卿，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辞贯圆通，自称极思，无遗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乎，历鉴前作，能执厥中，其致义会文，斐然馀巧。故称“《封禅》丽而不典，《剧秦》典而不实”，岂非追观易为明，循势易为力欤！至于邯郸《受命》，攀响前声，风末力寡，辑韵成颂，虽文理顺序，而不能奋飞。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绩寡，飘焰缺焉。^①

《封禅》篇在撰述这一文体的发展史时，提到“黄帝”、“大舜”、“成康”、“齐桓”、“秦皇”、“孝武”和“光武”七位统治者，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黄帝、大舜、周成王和康王作为名副其实的统治者皆赴泰山封禅，而春秋时齐桓公虽称霸却非帝王，故管仲劝阻其欲封禅之事，这是两个对比鲜明的阶段。第三阶段是秦一统后，李斯为始皇撰写的泰山刻石文，尽显法家辞气，堪称代表。第四阶段，到了汉朝，国力强盛，孝武帝时司马相如撰写的《封禅文》和光武帝时张纯的《泰山刻石》都是为君主封禅所作，尤其司马之作堪称首创，且文采出众。而扬雄的《剧秦美新》和班固的《典引》都是模仿封禅之文，各有所长。至此刘勰又补充了第五个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封禅第二十一》，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393～394页。

阶段：曹魏时期，虽然邯郸淳和曹植的作品皆属平庸，但也代表了封禅文体的发展情况。

6. 章表

夫设官分职，高卑联事。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故尧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辞再让之请，俞往钦哉之授，并陈辞帝庭，匪假书翰。然则敷奏以言，则章表之义也；明试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书诫，思庸归亳，又作书以赞。文翰献替，事斯见矣。周监二代，文理弥盛，再拜稽首，对扬休命，承文受册，敢当丕显，虽言笔未分，而陈谢可见。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主，皆称上书。

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按《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职司也。

前汉表谢，遗篇寡存。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左雄奏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第一；并当时之杰笔也。观伯始谒陵之章，足见其典文之美焉。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至于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琳琅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

物掣巧，随变生趣，执轡有馀，故能缓急应节矣。逮晋初笔札，则张华为俊。其三让公封，理周辞要，引义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鹤鹑》，莫顾章表。及羊公之《辞开府》，有誉于前谈；庾公之《让中书》，信美于往载。序志显类，有文雅焉。刘琨《劝进》，张骏《自序》，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①

章表这一文体，非常清晰地出现“秦”“汉”“前汉”“后汉”“魏初”“晋初”六个时间段限，其中“秦”和“汉”主要介绍章表名称的来历，其后四个朝代是章表发展的不同时期。前汉“遗篇寡存”，几无可述。后汉因为察举制度的考试需求，章奏开始兴盛，左雄和胡广当时都有杰出的创作。因曹操对汉末推让表文以三次为限和浮华文辞不满，故魏初章表讲究客观实在，这一时期代表者有孔融《荐祢衡表》、诸葛亮《出师表》，另陈琳、阮瑀、曹植等人都有各具特色的作品。有晋时期，整体风貌没有显著变化，具有代表性的有张华的让表、羊祜《让凯府表》、虞亮《让中书监表》、刘琨《劝进表》和张骏《请讨石虎李期表》等。

7. 奏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

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又近；李斯之奏骀山，事略而意迳；政无膏润，形于篇章矣。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观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章表第二十二》，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406～407页。

諫仙，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后汉群贤，嘉言罔伏。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懣于尺一，骨鯁得焉；张衡指摘于史职，蔡邕铨列于朝仪，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兴。若高堂天文，王观教学，王朗节省，甄毅考课，亦尽节而知治矣。晋氏多难，灾交屯移，刘颂殷勤于时务，温峤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①

唐尧虞舜时期，政事大臣们通过口头陈述意见，秦朝才确定上书奏事的程序，所以奏这一文体的发展分期是从秦朝开始的。“秦”“汉”“魏”“晋”四个非常清晰的朝代名称，领起四个各具特色的阶段，且都有宏观概述和代表作家作品出现。奏在秦时，主政之法家缺少文采，意义简单，王绾、李斯之作可见。有汉时期，奏又称上疏，内容典雅，文采可观，前汉诸如贾谊《论积贮疏》以及晁错、匡衡、王吉、路温舒、谷永等人皆有“识大体”之作，后汉杨秉和陈蕃敢于直言，张衡和蔡邕立论博雅，亦为代表。曹魏时期，擅长文采和理论的交替兴起，高堂隆、王观、王朗、甄毅各有所长。晋朝动荡，刘颂和温峤忠心为国，其奏可见。

8. 启

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必敛飭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②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奏启第二十三》，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421～422页。

② 刘勰：《文心雕龙注·奏启第二十三》，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423～424页。

三个清晰的朝代名称“汉”“魏”“晋”，也恰是启这种文体前后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汉时因景帝名启，避讳，故而没有称为“启”。曹魏时期开始称为“启闻”，文末有的称“谨启”。有晋以后，启体盛行，兼具奏和表的功能。

9. 议

昔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则其来远矣。洪水之难，尧咨四岳，宅揆之举，舜畴五人，三代所兴，询及刍蕘。春秋释宋，鲁僖务议。及赵灵胡服，而季父争论；商鞅变法，而甘龙交辩；虽宪章无算，而同异足观。迨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自两汉文明，楷式昭备，蔼蔼多士，发言盈庭；若贾谊之遍代诸生，可谓捷于议也。至如主父之驳挟弓，安国之辨匈奴，贾捐之之陈于朱崖，刘歆之辨于祖宗，虽质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张敏之断轻侮，郭躬之议擅诛，程晓之驳校事，司马芝之议货钱，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贾充之谥，事实允当，可谓达议体矣。汉世善驳，则应劭为首。晋代能议，则傅咸为宗。然仲瑗博古，而铨贯有叙。长虞识治，而属辞枝繁。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谲辞弗剪，颇累文骨。亦各有美，风格存焉。^①

上文出现的明确时间点有“三代”“春秋”“汉”“晋”，而轩辕、尧、舜和战国时期直接以重要事件和作家作品为代表。刘勰认为黄帝轩辕氏在明台议论政事是这种文体的起源，其后尧向四方诸侯首脑咨询治水人选，舜面对朝臣推荐的官员人选通过询问选定禹（治水）、弃（务农）、契（教化）、皋陶（司法）、垂（工业）五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议对第二十四》，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437～438页。

人人仕，夏商周三代向刍蕘之人请教办事，春秋时期楚成王因与鲁僖公会盟受其规劝释放俘虏宋襄公，这都是议体作用鲜明的事例，可以视为第一阶段。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因胡服骑射一事说服持反对意见的叔父公子成，秦孝公抵制甘龙反对而坚持商鞅变法政策，其中双方观点皆有律度支撑，在此基础上的互议更加凸显这一文体的价值，是为第二阶段。汉朝时双方变为多方，意见纷杂，产生所谓驳议的新形式，一直延续到有晋，是为第三阶段。前汉诸如贾谊、吾丘寿王、韩安国、贾捐之、刘歆等人，后汉诸如张敏、郭躬和曹魏之程晓、司马芝以及晋代何曾、秦秀等人都有因政事上书已见而被采纳的事例。最终刘勰又总结应邵驳议为汉首，晋朝傅咸和陆机虽各有缺憾，但自有风格。

议的别体有对策和射策，没有表现特别清晰的分期观念。有汉时期，只出现“汉文”“孝武”两个谥号和“后汉”一共三个时间点，以晁错（汉文）、董仲舒、公孙弘、杜钦（孝武）和后汉鲁丕作为“前代之明范”进行介绍。至于“魏晋”时期，善于用策之人鲜见了。

10. 书记

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巫臣之遗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又子服敬叔进吊书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辞，多被翰墨矣。及七国献书，诡丽辐辏。汉来笔札，辞气纷纭。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朔之《难公孙》，杨惲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盘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逮后汉书记，则崔瑗尤善。魏之元瑜，号称翩翩；文举属章，半简必录。休琰好事，留意词翰；抑其次也。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陈

遵占辞，百封各意。祢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偏才也。^①

同箴体类似，书记篇也是选择了“三代”、“春秋”和“战国”三个连贯的历史时期，并且更为进步的是加入了“汉”和“魏”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后续时期。作为记录“圣贤言辞”的书体，在政务尚不繁忙的夏商周时期，鲜为可见，此为第一时期。春秋各诸侯国往来频繁，书开始作为重要载体出现，其中秦人绕朝、郑国子家、楚国巫臣、郑国子产这四封书信，“辞若对面”，可为代表。此外又举了《礼记·檀弓下》记载之鲁国服敬叔奉命吊丧滕成公并送上国书以表慰问之事，以说明书体在春秋不仅盛行且多入史册，此为第二时期。第三个时期为战国，人们开始讲究文采，此处虽未举例，但是乐毅《报燕惠王书》、鲁仲连《遗燕将书》、荀卿《与春申君书》、李斯《谏逐客书》、张仪《与楚客书》等皆是现存可见的代表作品。第四个时期进入汉代，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东方朔《与公孙弘借车书》、杨恽《报孙会宗书》、扬雄《答刘歆书》等，风采各异；后汉崔瑗更是“善为书记”（《后汉书·崔瑗传》）。曹魏作为第五个时期，阮瑀、孔融、应璩都喜书体，而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和赵至《与嵇茂齐书》更为表率。

（二）不完全借助时间节点的分期实践

这类分期不完全借助时间节点，而是结合作家作品来代表时期，涉及颂、谐、论、说、诏等五种文体。

1. 颂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尝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理允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书记第二十五》，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455～456页。

备。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鞮，直言不咏，短辞以讽，邱明子高，并谍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又覃及乎细物矣。

至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駉》《那》，虽深浅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巡》，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又崔瑗《文学》，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挚虞品藻，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及魏晋辨颂，鲜有出轍。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①

关于颂体的论述，作者明确提出的时间点是“帝誉之世”、“秦”、“汉之惠景”和“魏晋”，但其分期并非分为三个阶段，而是结合颂体的发展，或以代表作品而界定。第一阶段在“帝誉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颂体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舞蹈来表达赞美德行之目的。第二阶段大体处于《诗经》时代，作者举出《鲁颂》、《商颂》和《周颂》，并且基本到了《商颂》以后，颂这一文体才算是“文理允备”了。同时，亦有民间颂体，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颂赞第九》，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156~158页。

以“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为特征，是为传统颂之变体。另有楚之屈原所作《橘颂》，“比类寓意”，将颂这一文体推广到可以表现微小的事物。第三个阶段则是秦汉时期，基本沿袭前制。刘勰首先举出扬雄之《赵充国颂》、班固之《安丰戴侯颂》、傅毅之《显宗颂》和史岑之《和熹邓后颂》，认为它们效法了《周颂·清庙》、《鲁颂·駉》和《商颂·那》等篇，做到了“褒德显容，典章一也”，是汉代颂体的优秀代表作品。相比之下，也有一些作品体制混乱，比如班固的《北征颂》、傅毅的《西征颂》、马融的《广成颂》和《上林颂》、崔瑗的《南阳文学颂》及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等。第四个阶段“魏晋”，刘勰各举出两位代表作家，曹植所作《皇太子生颂》，基本符合规范；而陆机之《汉高祖功臣颂》，颂及多人，“褒贬杂居”，则是属于乱世的讹体了。

2. 谐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譎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于是东方枚臯，铺糟啜醪，无所匡正，而诋嫚嫫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虽扞推席，而无益时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瑒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亏德音，岂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欤！^①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谐隐第十五》，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270～271页。

对于谐这种文体，论中仅出现“魏晋”一个时间节点，分期标志不很明显，但根据所举出的作家作品及特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战国及秦时期，根据作品的倾向分为两类，一类“意在微讽”，以“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为代表；一类以“譎辞饰说，抑止昏暴”为特征，比如“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体制虽有不雅，但用意典正。其次，两汉时期之东方朔和枚皋等人，虽自称赋家，然其作品“无所匡正，而诋嫚蝶弄”，出现了流弊。再次，魏晋时期的谐文，“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虽多“无益时用”，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辔”。

3. 论

圣哲彘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六韬》二论，后人追题乎！

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至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聚述圣言通经，论家之正体也。及班彪《王命》，严尤《三将》，敷述昭情，善入史体。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聘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详观兰石

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至如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

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頠，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至如张衡《讥世》，韵似俳说；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①

论这种文体始自《论语》，通过概述各家观点最终研究总结为一个道理，根据功能可以分为议、说、传、注、赞、评、序言和引言八类，其历史分期亦为纷杂，没有特别清晰的时间节点，朝代、统治者和作家、作品交织在一起。第一个阶段，作者列举了庄周《齐物论》和吕不韦《吕氏春秋》中的六篇论文（《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以及汉宣帝石渠讲经和汉章帝白虎论经等事，跨越春秋至西汉，认为皆是论文家之正体。第二阶段，举出班固《王命论》和严尤《将论》两篇，指其作论增加情感并善于用史，是为演变。曹魏时期作为第三阶段，初期受曹操影响兼采名法两家思想，曹丕、曹睿开始崇尚文采，至正始年间崇尚清谈的玄学开始兴盛。这时期傅嘏《才性论》、王粲《去伐论》、嵇康《声无哀乐论》、夏侯玄《本无论》、王弼《易略例》、何晏《道德论》皆为杰作。第四阶段为西晋，包括宋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论说第十八》，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326～328页。

岱《周易论》、郭象《庄子注》和王衍、裴頠等人辩论有无，蜚声古今。东渡后的江左时期，惟务谈玄，模拟前作，没有什么明显的发展。

4. 说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怪；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

暨战国争雄，辩士云踊；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至汉定秦楚，辩士弭节；酈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乎汉鼎；虽复陆贾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辩，楼护唇舌，颉颃万乘之阶，抵噓公卿之席；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溯洄矣。^①

说体滥觞于讨人喜悦之意，殷代的伊尹、周文王时的姜太公、春秋郑国的烛之武、鲁国的子贡，皆善美好的说辞，这可算作第一时期。“战国争雄”之际，“辩士云踊”，说作为一种文体，其能力重于九鼎、强于雄兵，可以苏秦、张仪为代表，是为第二时期。第三时期为“汉定秦楚”之后，辩士不再得势，酈食其、蒯通被烧死，陆贾、张释之、杜钦、楼护等人虽为硕者，但仅为顺势说话而已。

5. 诏策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渊嘿黼宸，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论说第十八》，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328～329页。

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降及七国，并称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

《诗》云畏此简书；《易》称君子以制数度；《礼》称明神之诏；《书》称敕天之命；并本经典以立名目。远诏近命，习秦制也。《记》称丝纶，所以应接群后。虞重纳言，周贵喉舌，故两汉诏诰，职在尚书。王言之大，动入史策，其出如绋，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陇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书辞；岂直取美当时，亦敬慎来叶矣。

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新；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及制诏严助，即云厌承明庐。盖宠才之恩也。孝宣玺书，赐太守陈遂，亦故旧之厚也。逮光武拨乱，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时或偏滥。诏赐邓禹，称司徒为尧，敕责侯霸，称黄钺一下。若斯之类，实乖宪章。暨明帝崇学，雅诏间出。安和政弛，礼阁鲜才，每为诏敕，假手外请。建安之末，文理代兴，潘勖九锡，典雅逸群。卫觊禅诰，符命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晋诰策，职在中书，刘放张华，并管斯任，施命发号，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弊乎！晋氏中兴，唯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自斯以后，体宪风流矣。^①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诏策第十九》，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358～359页。

诏作为一种文体，滥觞与定制经过了五个发展阶段：“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其在三代，事兼诰誓”，“降及七国，并称曰令”，“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汉之后，诏书作为天子告诫臣民的话语记录，其演变脉络，和不同统治者的喜好紧密相关，和朝代更迭没有必然关联，故而多位统治者出现在分期的时间节点上：文帝和景帝及以前的时期，诏书内容相对杂乱；汉武帝之后，尊崇儒家，用语弘奥，策封齐王、燕王、广陵王时“劝戒渊雅”，诏书严助颇显“宠才之恩”，及至宣帝赐太守于陈遂亦见“故旧之厚”；东汉光武帝之后，偏滥失当偶出；明帝章帝尊崇学术，诏书又见雅正之辞；和帝安帝荒于政治，鲜见执笔官员；建安末年，“文理代兴”，潘勖《册魏公九锡文》和卫凯《为汉帝禅位魏王诏》皆为佳作；魏晋之后，诏书由汉朝尚书省负责改为中书省负责，魏之刘放和西晋张华都曾主管诏书，东晋明帝特令温峤为中书令负责起草诏书。细数下来，诏策自汉代以后的发展一共七个阶段，其中十个统治者代表五个时期，另有年号和朝代各代表一个时期，而年号“建安”其实基本等同于曹操执政时期，所以以统治者作为分期的节点非常明显。但作者并非生硬地套进统治者的交替中，而是充分考虑到文体的内容、语言、作用等多方面，注重不同君主时期的不同表现特征。

（三）显示历史脉络却难以采用时间节点进行分期

这一类包括赋、赞、盟、铭、诔、碑、哀、吊、杂文、隐、史传、诸子、檄、移等文体。

1. 赋

在论及文学史的对象问题时，笔者已经指出，从班固“尊诗抑赋”到刘勰平视诗赋，赋这一文体的地位在文学史家的视野中上升

速度很快。前文也曾列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史家对于赋体史的编撰情况，这里就更有必要考察刘勰如何对赋体的发展进行文学史的关照。

《诠赋》篇对于赋史的追述，采用的时间节点有“秦”和“汉”，另有“宣”和“成”两个君主谥号但没有起到分期意义，并借用代表作家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赋的定体，“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再根据荀子之《赋篇》和宋玉之《风赋》确定了名称，从此和诗分开。这一时期没有具体的时间节点为断限，仅以三个作家作品来代表。“秦世不文，颇有杂赋”，这是作者对于第二阶段的简要介绍。第三阶段是以赋著称的汉代：“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通过举出相继出现于文坛的赋家，勾勒出赋体在西汉的发展情况，并得出赋兴于楚而盛于汉的结论。随后刘勰对大赋和小赋的特点分别作以介绍，并通过标举重点赋家和代表作品的方式，先后举出十位两汉时期的“辞赋之英杰”（包括宋玉）和八家“魏晋之赋首”，但对于魏晋时期赋体的发展却没有梳理论述，分期如此缺失，稍有遗憾。^①

2. 赞

赞体的变化相对简单，没有明显的时间节点，根据体式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并从虞舜时代开始就承担辅助说明的功能，一直到汉朝。此后，司马相如、司马迁、班固、郭璞等文人在撰文的过程中，加入赞美、贬斥等语气，体式亦稍有变化，但总体而言实用性不强，可以算作颂的分支。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诠赋第八》，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134~135页。

3. 盟

盟文始自周朝，相比前朝的约誓，盟文的政治意义更加明显，常常涉关国运。早期著名的有齐桓公和鲁庄公的柯地会盟、楚王与赵公结盟、秦昭公同夷人结盟以及汉高祖封侯的盟誓。其后作为盟约基石的道义被废，例如，臧洪与诸侯歃血为盟讨伐董卓以及晋代刘琨与段匹磾结盟兴晋，最终皆违背誓言导致盟约解体。所以盟文的分期是两个阶段，以其作用为标准。

4. 铭

铭这个文体起源很早，黄帝、大禹、商汤、周武王等圣贤都有在器物上刻字用以鉴戒的事例，但对于这一文体的历史，却没有明显的分期，只是根据鲁国大夫臧鲁对铭文的界定——“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①——来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代表铭文分类列举。而秦后至晋，作者亦举出代表作家作品：班固《封燕然山铭》、张昶《西岳华山堂阙碑铭》、蔡邕《黄钗铭》以及冯衍、崔骃、李尤、曹丕等人，论其优劣，虽特别点明张载《剑阁铭》超越前人，也难见文体脉络。

5. 诔

诔出现两个时间节点“周”“汉”，分期也简单如此，但难以见到文体发展的全貌。诔文源自周朝，春秋鲁庄公开始为士人作诔，代表性作品是鲁哀公为孔子和柳下惠妻为柳下惠所作者两篇诔文。汉世及以后，代表性作品是扬雄《元后诔》、杜笃《吴汉诔》、傅毅《明帝诔》、苏顺《和帝诔》、崔瑗《和帝诔》、崔骃《诔赵》、刘陶《诔黄》和潘岳《皇女诔》。

6. 碑

碑仅出现“后汉”一个时间节点，难以看出历史脉络。早期只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铭箴第十一》，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193页。

举出周穆王在弇山所提“西王母之山”五字即有立碑之意，后汉以来，蔡邕最为典范，创作有《太尉杨赐碑》《陈寔碑》《郭泰碑》《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广碑》等作品，孔融模拟蔡邕《卫尉张俭碑铭》和陈碑亦为佳作。至于东晋孙绰有志于碑文，也仅《桓彝碑》一篇尚佳。

7. 哀

哀虽然出现“汉武”“后汉”“建安”三个时间节点，但是这一文体的发展脉络并不鲜明，故而只是列举了《诗经·秦风·黄鸟》和汉武帝哀霍嬭诗、后汉崔瑗哀汝阳公主以及苏顺和张升之哀文、建安时徐干《行女》和潘岳《金鹿哀辞》和《泽兰哀辞》，介绍各个作品的特点，但不涉及这一文体在某一时期的风貌。

8. 吊

吊没有出现任何时间节点，只是列举了从春秋到东晋间的作家作品及各自特点，也没有梳理明显的历史脉络。其中最早的吊文是贾谊《吊屈原文》，其后司马相如用赋的题材哀秦二世，至于扬雄《反离骚》、班彪《悼离骚》和蔡邕《吊屈原文》均为依傍贾谊之作，胡广、阮瑀、王粲各有哀吊伯夷，叔齐的文章，此外祢衡《吊张衡文》和陆机《吊魏武帝文》也各有特点，之后再没有值得称赞的了。

9. 杂文

杂文涉及对问、七、连珠三种文体，但皆没有进行分期论述，仅仅是列举了首创者和后继之代表作家作品。对于始自扬雄的连珠体的叙述，只列作家作品论其特色，却无文体史的分期阐释。刘勰举例还有后汉杜笃、贾逵、刘珍、魏潘勖及晋陆机等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家，

10. 谶

谶之文体，也仅仅列出“魏”一个时间点，以此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有萧国还无社、吴国申叔仪、楚国伍举、齐国客人、楚国庄姬、鲁国臧文仲等战国士人通过隐语“兴治济身，弼违晓惑”^①，但至西汉东方朔时规劝补救的意义就少见，仅为戏笑而已。魏代之后，反对倡优，谶语化为谜语，曹丕、曹植、曹髦皆有实践，但于典正规劝都无关联了。

11. 史传

史传中出现的时间点有“轩辕”“周”“战国（纵横之世）”“汉”“后汉”“魏代”“晋代”七个，其分期不是根据这一文体在某一时期的发展状况而断限，而是针对某一时期的史书撰写来论述，修史者可能跨越数个朝代，所以关于这一文体的文学史分期情况不甚明显。早在上古时期，黄帝就命仓颉作为史官，所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的模式也早已建立。到了周朝，统一历法，修史一度风气井然：孔子据鲁国历史修《春秋》，左丘明作《左传》，至平王东迁后随着政局动荡而力弱。战国时代，保存史官而已，其历史在秦统一后凑编而成《战国策》。史传这一文体在汉朝之后发展迅猛。首先是陆贾作《楚汉春秋》，然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登上历史舞台，创造性地推出《史记》一书，奠定了古代正史的书写模式，班固以之为榜样又作《汉书》，虽然都有缺失，但成就卓著。有关后汉和魏晋历史的作者基本集中于晋代，因为大多沿袭司马迁开辟的思路模式，所以刘勰只能按照修史对象进行分类阐释：有关后汉史，举出了班固《东观汉记》、晋代袁山松《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薛莹《后汉纪》、谢沈《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数种；有关魏代

^① 刘勰：《文心雕龙注·谐谑第十五》，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271页。

三国史，则有晋代孙盛《魏氏阳秋》、魏鱼豢《魏略》、庾溥《江表传》、张勃《吴录》数种；有关晋代历史，则是晋陆机《晋纪》、王韶《晋纪》、干宝《晋纪》、孙盛《晋阳秋》、邓璨《晋纪》等。所以涉及分期，其实可以以司马迁《史记》为界，而不是分期明显的文体。

12. 诸子

诸子始自战国，周文王曾向鬻熊请教，后人记录成为《鬻子》，这是最早的以“子”命名的书籍。而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讲道德所著《老子》一书则是四部之子书的开端。刘勰对诸子的论述，以朝代和溢号为节点，出现“七国”“暴秦”“汉成”“魏晋”四个时期，但诸子主要历史就在战国时期，汉之后虽然有些名为论实为诸子的著作，大多依傍儒家学说，鲜有各成一家之学说，所以若严格分期，也就两个时期。首先，七国争霸人才涌现，孟子、庄子、墨子、尹文、野老、邹子、申不害及商鞅、鬼谷子、尸佼、青史等人各树门派，且继承者不可胜数。然后，秦朝烈火虽未及诸子，但再无众派名家出现。汉成帝命刘向整理成书《七略》，会集诸子百有八十余家。魏晋之后，作者和著述间出，虽体量巨大，但无甚可表了。

13. 檄

“有虞”“夏后”“殷”“周”四个时代军队的宣誓是檄文的源头，是为第一阶段。“春秋”作为第二阶段，提到了刘献公、齐桓公、晋厉公、管仲、吕相为各自诸侯国的讨伐发出的檄文，其意义和后世檄文无二。“战国”正式确定檄文的名称，以张仪《檄告楚相》为代表，是为第三阶段。此后刘勰对檄文的发展只是列举了后汉隗嚣讨伐王莽之《移檄告郡国》、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曹魏钟会《移蜀将吏士民檄》和东晋恒温《檄胡文》，没有具体论述不

同阶段文体发展的特点。

14. 移

移体也只是列举了西汉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刘歆《移太常博士书》和晋陆机《移百官》三篇文章，没有以历史的视角梳理文体的发展。

小 结

根据分期实践的清晰程度，将文体论划分为三类逐一分析，可以发现大约一半的文体可以通过时间节点将文体史划分阶段，这个时间节点可以是朝代名称、统治者称谓、年号、谥号等，也可以以代表作家或代表作品作为引领标志，余下的文体史大多可以展现出历史发展，却没有明确的时间观念。具体到时间节点来看刘勰的选择习惯，就朝代名称来说，涉及“汉”三十三处，“魏”二十七处，“晋”十六处，“宋”则仅有三处。其中包括确指这个朝代，以及引出该朝代之人名者。刘勰重点论述的是汉魏晋文学史，这是其文学史的断限。而对于年号，刘勰却明显具有“抵触情绪”，起于汉末建安，迄于齐末中兴，近百个年号（不包括十六国时期）中，被作者提到的只有“建安”和“正始”这两个年号^①。

结合《时序》篇来看，相比魏晋时期的文学史家，虽然刘勰文学史书写的成就更为斐然，但对于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处理方法，二

① 对《文心雕龙》进行年号搜索时，还可以发现“太康”和“大明”这两个年号名称。太康（280~289）为西晋武帝司马炎之年号，《文心雕龙》于《卷二明诗》出现1次，但非有晋之太康：“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大明（457~464）为南朝宋孝武皇帝刘骏之年号，《文心雕龙》中出现3次，却无一一是作为年号。《卷四诸子》：“按《归藏》之经，大明迁怪，乃称羿弊十日，嫦娥奔月。殷汤如兹，况诸子乎！”《卷五议对》：“夫驳议偏辨，各执异见；对策揄扬，大明治道。”《卷六通变》：“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月生西陂’。”

者则相互呼应，基本囊括了其他文学史家所有的分期方法，由此印证《文心雕龙》作为一部“体大而虑周”的作品，体量之大、思虑之精远超同时期或者前期的文学史书写成果，“集大成”之赞誉所言不虚。